



2009年7月25日第18期

总第二十八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风云人物

[纪坡民](#) 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口述历史

“[三二九运动](#)”暗含对毛泽东的谴责——李良玉教授访谈（节录）

文摘

[武丽丽](#)、赵鼎新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

蓦然回首

[钱大川](#) 毛主席头像事件

故纸堆

[文革教材](#)节选·数学

小资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编读往来

一，[旅欧读者](#)金瑞来信谈感想 二，[旅美读者](#)Chuang^Chen 来信纠错

【风云人物】

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纪坡民

文革开始时，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是刘建勋，“二把手”是文敏生，我父亲纪登奎的职务是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委秘书长。听说，在省委的领导人中排名第八，只是个“八把手”。

虽然我父亲于1963年已调到省委担任上述职务，但因为1964年商丘地区遭受水灾，他又到商丘兼任了地委第一书记，基本在商丘地区主持救灾。救灾工作于一年后基本结束，按省委分工，他又担任了全省“四清工作总团”的团长，负责具体指导全省的四清运动。一直到1966年8月，文革已经开始了，“十六条”也公布了，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呢。

1966年8月，河南省委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纪登奎才调回省委，担任了省委文革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从这时起，他才介入文革的事。

那个时候，省委文革小组的所谓工作，就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拨又一拨地接待川流不息的群众组织，还被“革命群众”揪来揪去，弄到各个大专院校去检查“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

听父亲说，文革开始时，因为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并不在省委工作，所以“派工作组的错误”，并没有他本人什么事，把他揪到各单位去，只是“替省委作检讨”。而他当时的思想，不仅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也是“很不理解”的，而且，“派工作组是路线错误”在当时早已被党中央“定性”了，纪登奎还坚持认为，“派工作组只是个形式，是不是错误路线，要看工作组工作的内容。”这种态度，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顽固”和“保守”的。

1966年9月，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调到北京新市委了，文敏生接替他主持省委工作，担任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我父亲在省委和文敏生的领导下，仍然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在非常混乱与困难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局面。

到1966年年底的时候，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陶铸和代理第一书记王任重“出问题”了，因为文敏生是中南局调到河南的，社会上有些人便以讹传讹地认为他是“陶、王黑线上的人”，要打倒他，文敏生思想压力很大，被折腾得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时候，河南省委有些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动摇；这里的历史缘故还有，这些省委领导“大跃进”时跟着吴芝圃搞“极左”，1961年中南局改组河南省委时，曾经批评和处理过他们的问题，这些人不服气，看到刘建勋调

走了，文敏生也快不行了，就想乘机为他们过去的错误翻案。

戴苏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当过省委秘书长，这时对我父亲说：“老纪，你看这形势，省委搞得这么被动，要不，咱们俩也起来造反吧？”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拉上我父亲一起“站出来”，带头打倒文敏生。我父亲对他说，“老戴呀，你看，刘建勋调到北京了，现在形势这么困难，咱们省委应当团结；再说，人家文敏生当第一书记，一共才几个月时间，能有多少错误呢？”父亲拒绝了戴苏理拉他“起来造反”的意见。

1967年初爆发了所谓“一月革命”，河南的形势更乱成了一锅粥。河南省委终于瘫痪了，我父亲也于1967年1月被关押起来了，家里人不仅见不上面，也不知道他关在那里，连是死是活也没有个消息，只有在郑州开批斗大会时，家里人看到造反派把他拉到会场上低头、弯腰、挂黑牌、“坐飞机”，才知道他还活着。文革期间社会上流传的说法，“纪登奎坐了一百多次飞机”，就是这个时候的事，这一段时间，有将近半年。

人们一般认为，河南的造反组织是“二七公社”，因为于1967年2月7日成立而得名。这时候，我父亲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二七公社”的成立，他既没有参与，更谈不上支持，实际上，连“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他也是几个月以后才听说的。

1967年1月，毛主席决定实行“三支两军”，不久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河南省委瘫痪了，军队接管了政权；当时，主持河南省军区工作的是政委何运洪，他实际掌握着河南全省的局面。

1967年3月初，河南省军区发布“声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组织”，把“二七公社”镇压下去了，抓了好几千人。到1967年4月，北京红代会和军事院校造反派先后到河南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形势又开始动荡起来了。不过，纪登奎仍然被关押着，对这些情况完全不知道。

大概是1967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吧，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找到被关押的纪登奎采访，当纪登奎听说省军区抓了很多人时，他对这位记者说：“听说现在抓了很多人，这些青年学生，都还是些孩子嘛，他们有什么责任呢？我是省委文革小组成员，文化革命，是我们号召他们参加的，责任应当由我们省委这些领导人来负。如果说参加文化革命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的话，省军区要抓人，那

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应当我去坐班房。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罪，省军区不应该抓他们，应当把他们放出去。”后来纪登奎讲的这番话，这位解放军报记者不知怎么给传出去了，被红卫兵写成大字报，贴在省委和省军区大院的围墙上，而且到处传抄，搞得全省都知道了。不过对这些情况，还被关押着的纪登奎当时也不知道。

可是，纪登奎对解放军记者的这次谈话，在社会上却搞得很轰动。因为“二七公社”当时正在“受压”，被抓了好几千人，看到纪登奎的谈话，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他们在那种处境下，那时候的说法，对纪登奎是“路线出感情”吧，就认为他是个好干部，那时叫“革命领导干部”。就这样，纪登奎就成了“二七公社”拥护和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了。

所以，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个话在精确程度上还稍有一点偏差，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应当是：因为造反组织的支持，纪登奎才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再说得清楚一点，不是纪登奎支持“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而是“二七公社”支持纪登奎当上了“革命领导干部”。虽然这两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区别不大，但后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

1967年3月中旬，河南省委领导成员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省军区主持的会议上，由省委一位书记赵文甫率先发难，另一位书记戴苏理紧跟着表态，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公开起来造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反了。因为这些省委领导人当时认为纪登奎是同刘建勋、文敏生站在一起的，所以把纪登奎也捎上了。在社会上，这些省委领导人公开表态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群众组织同“二七公社”是对立的。所以，1967年上半年，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喊的口号是，“打倒刘、文、纪！”

1967年4月以后，因为河南形势动荡，中央让河南省军区到北京汇报文革情况，还要求河南两派的群众组织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也一同到北京参加汇报会。这时候，在北京参加汇报会的“二七公社”的代表，便提名纪登奎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到这时，纪登奎仍然在河南关押着，对外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既不知道有些省委领导成员已经“造反”，把他和刘建勋、文敏生捆在一起，要

打倒，也不知道“二七公社”在北京已经提名他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连中央在“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又发布了“军委十条命令”的文件，也不知道。在关押中允许他看的，只有一本袖珍版的毛选四卷合订本。

到1967年5月份了，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好几次了，周总理问，你们“二七公社”一派的领导干部是谁？怎么还没有来参加汇报？这时，“二七公社”的代表也着急了，让他们在郑州的人赶快想办法。后来，他们“二七公社”的人，终于打听到纪登奎的关押地点，深夜采取行动，把纪登奎抢出来了；而后，又把他送到郑州铁路局，因为怕对立的一派中途拦截，让他装扮成司炉工，钻在火车头里，还用煤把脸抹黑了，送到了北京。

到了汇报会河南代表团驻地西苑旅社，我父亲才成了支持“二七公社”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若仔细分辨这件事的实际过程，打个不大准确的比方吧，纪登奎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倒是和辛亥革命时黎元洪的情况有点相似：辛亥革命时，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官兵从床底下把他拉出来当上了“革命领袖”的，在黎元洪看来，他是大清朝的将领和臣子，他根本没有想到去当而且死活也不愿去当那个该当“灭门之罪”的“乱党”和“草寇”。而文化革命中，纪登奎则是“二七公社”从关押地点把他抢出来、乘火车头送到北京的中央汇报会上，才当上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同黎元洪的情况还有点相似的是，在纪登奎当时的观念里，他是正儿八经的“党的领导干部”，恐怕也没有什么兴趣，要支持造反组织，去当他们的“后台”。

说起来，那个时候，无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或者在中南局的陶铸和王任重那里，还是河南省委刘建勋和文敏生手下，纪登奎都是相当得宠的“大红人”，又是刚提拔到省委，心劲儿足得很，正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忙他的“党的工作”。那个时候，纪登奎既没有在党内受排斥、坐冷板凳，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迫害，比如被打成“右派”或者“右倾”什么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历史恩怨的理由，要起来“支持造反组织”去夺省委领导的权。

而且，纪登奎作为一个地方干部，当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种事情，那时都是在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上、在党中央的鼻子底下发生的，都是中央知情、认可、甚至“赶鸭子上架”的，并不是他纪登奎“阴谋策划”、“秘密串

联”、“煽风点火”，要起来“造反夺权”。

当时，在北京参加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的，共有三派，一派叫“二七公社”，一派叫“河造总”，一派叫“十大总部”。而实际情况，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联手、共同对抗“二七公社”的格局。

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两个多月，周总理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八次。到1967年7月25日夜，周总理讲话，对河南文革问题表态：

“二七公社”，被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这意味着中央支持这一派；

“河造总”，被称为“犯错误的造反派”，这一派属于“团结对象”；

“十大总部”，则被称为“保守组织”，周总理还有一句相当严厉的话，“十大总部应当分化瓦解”。

后来，毛泽东还讲过：“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中央在那个时代的这个表态，是一种典型的“左、中、右”的思维模式。在当时，这也是中央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前，对其他几个省的文革问题，中央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处理的。

最终的结果，军区政委何运洪挨了批评，中央批转了河南省军区党委对“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报告；中央决定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重新回河南任组长，空降兵15军政委王新担任副组长，我父亲也是副组长。后来成立河南省革命委会时，我父亲是副主任。

1967年7月底，我父亲回河南时，又成了省革筹的“当权派”。那时，省革筹的所谓工作，就是解决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文革问题，主要是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让分裂对立、文斗加武斗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并按照“三结合”的原则把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总之，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把政权组织起来、建立秩序、恢复生产。

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办法，是由当时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省革筹工作组到现场去，当时河南全部十个地市、一百多个县以及大型企业的大多数，都是纪登奎带队去解决的。父亲后来对我说：“在省革筹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分工时，分给我的任务，是负责专门解决全省各地的‘老、大、难’问题。”说到这里，他笑着摇摇头：“你说说，这领导班子里，哪里有这么分工的？”

对解决这类问题，纪登奎似乎摸索出了一套办法。记得还是1967年底，父

亲从豫北回来，很得意地对我说：“在豫北，两个月时间，我解决了三十多个县，一天一个县。”

据说，这些情况，都被新华社记者用“内参”发往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后来到“九大”时，纪登奎被毛主席提拔到中央，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父亲在八十年代“忆旧”时对我说：“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还能在群众运动的混乱局面中解决问题。”

当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时纪登奎在河南解决这类问题，自然都要按照中央这种“左、中、右”的思想模式。这一段时间，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才算是名符其实了。

不过，如果认真研究文革史的话，应当注意到，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后，中央对各省文革问题的处理，同原先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了，从1967年夏秋之际开始，中央解决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有了变化：

此前，我们可以称为一种“倾斜性”的方针，政治表态，是“支持左派”，在组织上，“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时，则要求以“左派”为主或者占优势，河南之前的几个省的问题都是按这种方针解决的，河南问题也是按这种方针处理的。而此后，则可以称为一种更为“平衡性”的方针，对各省文革中的各派，政治表态不再有“左、中、右”的明确区分，在组织上，也不再要求“左派”为主或者占优势。

如果纯粹从“政治学”的学术角度来看，中央解决各省文革的方针，改变“左、中、右”的思维模式，由“倾斜性”的方针改变为“平衡性”的方针，不仅相当重要，而且比较合理。这个变化，不仅作为当时解决各地文革问题的方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对重新审视我们党从建国后到文革前的治国理念，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说起来，这种“左、中、右”的思想模式，也是由来已久了，实际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如今名气很大的“反右斗争”，也都是这样。

以文革的情况来说，如果我们不是仍然陷在当年“派性”的感情旋涡里，而是能够比较冷静、公允、客观和理性地审视当年的情况，这种“左、中、右”的思维模式和“倾斜性”的方针，毛泽东是这样，刘少奇也是这样，所谓“五十天的反动路线”是如此，后来的“批判反动路线”也是如此，并没有什么不同。毛

泽东“批判反动路线”和刘少奇“五十天反动路线”真正的区别，是在他们两个人的心目中，“依靠、团结、打击”的“左、中、右”，恰恰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五十天反动路线”时期的“右派”，到“批判反动路线”时却成了“左派”。

我们在文革时代看到：正是由于对应当“依靠、团结、打击”的“左、中、右”在认识上是对立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在文革实践中演变成两种社会力量的对抗，也就是文革时代最常见的“两派”的“派性斗争”，并且由“文斗”到“武斗”、搞到“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

中央对各省文革问题的处理，由“倾斜性”方针向“平衡性”方针的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问题、由于什么机缘而发生的？我想，可能与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有关。

1967年夏，湖北省两派矛盾激化，武汉更是十分尖锐，“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中央发布了严禁武斗的《六六通令》，可是不顶用，武斗反而越演越烈了。到7月中旬，毛泽东亲自带队，领着一大批党政军要员，到武汉开“现场会”解决问题。可是，中央在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时，不是实行一种“平衡性”的方针，先对各派平等对待，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具体问题，再对有关各方的是非曲直作出评判；而是实行一种“倾斜性”方针，“下车伊始”，甚至人还未到，在北京已经定下的方针就按照“左、中、右”的思维模式，确定了解决问题的结论性意见。这个结论性意见，认为不应当把“钢工总”打成反革命，为此而批评武汉军区领导，应当说还是有道理的；可是，将其中的一派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而将另一派称为“保守组织”，则是“倾斜性”方针的典型表现。

而且，就这么个方针，解决的程序也有问题，没有先把军队“老总”们的思想做通，就公诸社会了；于是，立即引起“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不满，结果闹出一场大乱子，差点演成一出共产党版本的“西安事变”。可见，处理政治问题，也是一门学问，违背了“客观规律”即现代国家的基本原理，不符合人们普遍认可的常情常理，不仅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人们会不听，甚至他老人家“御驾亲征”，也不灵光了，照样把事情办砸了。

当然，自1967年夏秋，作为中央解决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这是一回事；各省在处理本地文革问题时，是否也能够实现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在各派之间做到比较“平衡”一些，则是

另一回事。许多省的情况，文革中两派最后的结局，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政治与组织上对某一派的“倾斜”，这主要取决于当地领导者（开始是党政领导后来是部队首长）的意志。而各省发生这种“倾斜”的方向，往往又同前一段时间中央“倾斜”的方向是相反的。这样看来，前一段时间中央实行“倾斜性”方针，大概也是针对各地的“倾斜性”的一种“校正”，或者用一句更为流行的话，叫“矫枉过正”。尽管如此，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变化，中央处理文革问题的方针，显然变得比较合理了。

我不是研究文革史的，不过我的印象，中央实行这种“倾斜性”方针，河南大概是最后一个省。河南省革筹在处理本省文革问题时，自然也是执行这种“倾斜性”方针的，如成立省革委时，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名额，“二七公社”为主，“河造总”为次，“十大总部”则没有份儿。

据我所知，我父亲当时很密切地关注着中央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而且，研究政策历来是他的所长，在这些方面思想也相当敏锐；纪登奎看到了中央方针的这个变化，而且在处理河南文革问题的实践中，对原来“倾斜性”方针作了一些调整和校正，使之略加“平衡”一些。

比如，对“十大总部”，本来周总理已经讲过“应当分化瓦解”的话，可纪登奎强调：虽然作为全省的群众组织，“十大总部”已经解散了，但“十大总部”下属的基层群众组织，仍然可以参加“大联合”和“三结合”，在基层革委会中占有席位。

这里我插一段故事，也许可以反映我父亲的政治理念。记得是1967年秋，我回家探亲，有一天，有我，还有我妹妹和她的同学，聚在一起闲聊，父亲回来了。那个时候，人们聊天，没有别的话题，都是谈文化革命；大概是说起了戚本禹，那时河南人一般都认为，戚本禹支持“二七公社”的态度最坚决，主要是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北京汇报结束时，“十大总部”对中央的表态很不满意，就围攻戚本禹，非要他表态：“十大总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戚本禹怎么说，他们也不服，于是恼了，就和他们对着吵：“十大总部是保守组织，是老保！你们就是老保！”父亲听我们说了一会儿，慢悠悠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拥护戚本禹那些人，赞成他们的话。”听了父亲的话，我们一愣，记得是我妹妹的同学问他，“那你赞成谁的话？”父亲说，“戚本禹那些人的话，讲得不行。我们

这些老家伙，还是觉得总理的讲话，比较靠得住一些。”

记得当时还说到一些中央领导对“七二〇事件”讲话时，痛骂武汉“百万雄师”和四川“产业军”，还把“百万雄师”说成“百完熊尸”等；听我们说得很热闹，父亲很不以为然地说：“把百万雄师、产业军骂成那个样儿，都是在中央工作的人了，怎么能那样讲话呢？总理的话，就不是那么个讲法。”不记得是谁插话问，“那为什么？”父亲接着说：“周恩来是总理呀！武汉的‘百万雄师’也好，四川的‘产业军’也好，还有河南的‘十大总部’，有那么多群众呢，你把他们骂成那个样儿，讲的那么凶，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对总理来说，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不管怎么说，这天底下的中国人，还不都是他周恩来的老百姓嘛。”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都相当偏激狂热，我也一样。父亲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使我的观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不像原来那样，对文化革命时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持那么黑白分明的看法了。

不过总的来说，作为省革筹的成员，纪登奎在处理河南各地文革问题时，基本上仍然执行的是中央确定的“倾斜性”方针。所以，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基本上还是对的。我想，这也是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对他有这种看法的原因。

这里顺便插几句。我认为，中央处理文革问题的方针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也正是所谓“王、关、戚事件”的一个政治背景。1966年底，在毛泽东看来，陶铸的想法，妨碍了他将文化革命全面推向高潮，因此，陶铸在文革初期提拔到中央不到半年，就让毛泽东“拿掉”了。到1967年秋，可能是为了给文化革命狂热的势头“降温”吧，“倾斜性”向“平衡性”的方针转变，由于弯子转得太急，王、关、戚也就从文化大革命的战车里甩出来了。

说起来，为了纠正和扭转一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而在党内找个“代表人物”来批判，引导党内和社会的思想潮流，这也是我们党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司空见惯的做法。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搞的文化革命同我们党以往的政治运动，在对“左、中、右”的态度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但在情况紧急时，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失控，为大局计，主要是稳定军队，这种老办法，他也会拿来一用。

“王、关、戚”如果觉得冤枉，那陶铸呢？和陶铸相比，他们只是小人物。

1967年秋，毛主席“南巡”，那一次叫“巡视大江南北”。到了郑州，接见河南省领导，他和纪登奎有一段谈话，当时传得很广、名气很大。因为过去和纪登奎很熟悉，所以毛主席一见面就称他“我的老朋友”。如今有些人认为“老朋友”的称呼，毛主席好像有什么特别含意似的，其实这只是主席很随便的一句话。

毛主席接着就问：“听说你坐了一百多次飞机？”

纪登奎说：“这对我大有好处。”

当时，毛泽东还问，“坐飞机”是个什么样子？纪登奎站起来比划、作示范，毛泽东也跟着学“坐飞机”的样子，弯腰，手向后举，还问“是这样吗？”毛泽东问他，“坐飞机”什么感觉？纪登奎说，“啊呀，腰酸得很，感觉就和割麦子差不多。”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好像就是那么瞎扯。

后来，八十年代了，父亲对我说起那一次毛主席和他的谈话：“那次和主席一见面，我就和他开玩笑、说笑话，主席很高兴。”

父亲接着说：“那一趟南巡的时候，毛主席见了不少他过去的老熟人，有长征时的警卫员；这些老熟人，一见到毛主席，咕咚一声就跪下了，接着就是号啕大哭，然后就诉说他们文革中间受冲击、挨批挨斗、挂黑牌、‘坐飞机’那些事，觉得冤枉得不行，他们受的那个委屈也确实大了。那次南巡，主席见到的那些老熟人，大概都是那个样子。可毛主席不大高兴，他不喜欢他们那个样子。”

父亲说：“毛主席见我的时候，我和他开玩笑、说笑话，他很高兴。后来把我提拔到中央，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认为我在文化革命中能够‘正确对待群众’，那个时候，毛主席很看重这一条。”

可是后来，许多老干部对纪登奎说的“大有好处”这句话、还有他后来讲的“三个正确对待”（就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很不满意。这当然有道理，老干部在文化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纪登奎却说“大有好处”，而且还要“正确对待”，那不等于说，他们受那么大的罪，是完全应该的！难道今后还要受那样的罪吗？所以文革结束以后，纪登奎写检查，还专门检查了他当时说的这几句话。

这桩“坐飞机”的事，后来还有点故事。文革结束后，河南又批判纪登奎时，说道：“纪登奎说他文革中坐了一百多次飞机，是欺骗毛主席、欺骗党和群众。”

实际上，据统计，文化革命期间，纪登奎‘坐飞机’，只有九十七次。”这是1978年贴在省委门口的大字报，我亲自看到的。好玩吧？

这个“倾斜性”和“平衡性”的问题，后来还有点余波，也有点意思。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时，毛泽东亲自点名，由纪登奎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作大会发言，他可以算是因为“支持造反组织”，当了“领导干部典型”了。

可是，大会发言后，却闹了点小“风波”：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前，中央按照“倾斜性”方针成立革委会的几个省，可能是六个吧，这几个省的革委会主任，父亲说，“就是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他们那些人。”还有谁？有没有张春桥？他没有讲。他们几个跑到纪登奎住的房间批评他，提的意见，主要是对纪登奎在大会发言时讲的“一派不行，两派才灵”这句话很不满意。父亲说，“他们几个人，把我围攻了一顿，可是，我拒绝了他们的批评意见。”

由此可见，对处理文革问题的“倾斜性”方针，纪登奎还是有所修正和保留的。如果允许我替父亲做点辩护的话，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这“典型”二字，还稍有些可以商榷之处；从“九大”期间因为纪登奎的大会发言而“被围攻”的不大的“风波”来看，作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纪登奎还不算很“典型”，而他说的“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他们那些人”，可能更适合当这个“典型”。

毛泽东在“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中，没有选择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等人，而挑了纪登奎在“九大”作大会发言，大概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倾斜性”方针和“平衡性”方针的斟酌与反思，反映他在处理文革问题时思维方式的转变。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时，纪登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两个月以后，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工作。我父亲在中央期间，花费很多精力管的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全国各省、中央各部门和一些大型企业的文革问题。

这些问题的大致情况都是，中央每发生一次大的“风波”，文革前期的“派性”问题就被触发，又闹起来了，两派的群众组织头头自然是“闻风而动”，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也分成两派，当地的军队领导部门和驻军部队首长也掺和在里头，不仅“三结合”成了“三凑合”、“三磨擦”，而且“军、干、群”各自又都分成两派，矛盾尖锐得很，闹得一塌糊涂，党委瘫痪，政府办不成公，

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学校上不成课，影响到社会秩序也乱得很。

这时候，我父亲的角色变了，成了“中央领导人”了，周总理太忙，后来又病了，他说纪登奎是个“壮丁”，于是，解决这些问题就交给他来办了。

听父亲说，文革时代他在中央工作期间，全国各地的文革问题，他直接参加解决过的，至少有二十个省，许多省的问题，都不止解决过一次，起码是两次，有的甚至是三次。他解决各省的文革问题，第一个省是山西，1969年7月；最后一个省是浙江，1975年7月。

对各地的文革问题，纪登奎解决的次数多了，似乎也从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掌握了一套方法；大体上的程序，就是让那些出问题的省份“军、干、群”各方人物到北京来，找个宾馆办“学习班”，听他们谈情况、说是非、争论、有时吵得很厉害；然后弄清情况、分辨是非，由中央领导人去讲一篇话，大约有一个多月，就解决了。这个省的领导班子，回去以后就基本上又能工作了。有一次，我问他：“山西问题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解决的？”他说：“山西的问题，和南阳的问题一样。解决南阳问题，用了七天；解决山西问题，用了23天。”可是，南阳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听明白。

文革结束以后，清算毛主席的错误，纪登奎自然难辞其咎，他在党内被批判，后来又下台了。共产党过去的老规矩，一个人落到这种地步，自然是翻箱倒柜，他过去管过的事、处理过的问题，事无巨细，都要揭发批判，统统过一遍。纪登奎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事，自然也不例外要受此对待。我父亲说过：“我处理过的各省文革问题，后来大家揭发批判，对我提了意见的，有一个半，一个，是河南省，半个，是山西省。”说这话的时候，是八十年代，父亲下台好几年了，时过境迁，父亲说起来，也比较轻松些了。”河南的事情，我还知道一些，可山西那“半个问题”出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由此看，纪登奎解决各省文革问题，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处理的还算是比较公道的，对两派问题，当时他的几句话，如“一碗水端平”、“折墙平沟解疙瘩”、“两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等，基层的干部群众反映还不错，也可以说，他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平衡性”的方针。当然，在我们党那么多的功臣战将里，纪登奎的资历相当浅，对那些纠缠不清的文革问题，大概他要费许多口舌、在错综复杂的“是非窝”里讲出几条能说服人的道理才行，光有几句“原则

性”的“中央领导指示”，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至于像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地位和气魄，以他的“倾斜性”方针，对抗各地党政军大员的“倾斜性”方针，以一人之力就可以抗衡整个党的力量；纪登奎在我们党那么多老资格面前，只是个小人物，即使他“比葫芦画瓢”想学毛主席的样子办事，也根本没有那个本钱。

河南文革期间的事，还有一件，相当有点蹊跷。

文革期间的1967年上半年，本来河南的口号，是“打倒刘、文、纪！”他们三个人被捆在一起打倒，是同样的处境。可是，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刘建勋和纪登奎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三结合”；文敏生却被中央作为“走资派”点了名，遭受了许多年的坎坷。

有些人因此责备刘建勋和纪登奎，其实，这种人事安排，都是中央决定的，刘、纪他们当不了这个家。据说，是当年一位中央领导人对毛主席说，文敏生这个人，“貌似忠厚，内藏奸诈”，毛主席相信了，于是文敏生就当了“走资派”。毛主席还说，这位中央领导人不庇护自己的部下，意思是不搞“宗派”的意思。

不过，文革时代的事，祸福相依，河东河西，也难说得很。“貌似忠厚、内藏奸诈”这句话，文革时代自然让文敏生倒了霉，可后来对他却成了好事，文革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邮电部长。如果那个时候，文敏生和刘建勋、纪登奎一块参加“三结合”，还不一样得陷进文革的是非窝里，那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可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还有这么件事，也值得一提。到1986年了吧，纪登奎已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下台好几年了，有一天，何运洪的儿子来北京办事，到家里来看望他。我父亲有点意外，坐下聊天，先对他说：“你爸爸身体还好吧，替我问候他。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批判过他，对不起他，应当向他道歉。请向你父亲转告我的意见。”何运洪的儿子说：“你们之间过去那些事，就不用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话了；那个时候，你批判过他，他也批判过你呀，而且他还把你关起来了嘛。”说起文革时代的恩恩怨怨，他们两个人谈话的气氛挺轻松的。

何运洪儿子来访的事，后来父亲对我提起过好几次。何运洪和我父亲文革前可能也认识，他也是老革命了，都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对他们文革时代形成的恩怨纠葛，能够冰释前嫌，父亲显然感到很高兴。何运洪

这个儿子挺有水平的，可惜我不认识他。

文革结束以后，1979 年吧，我在河南省机械厅工作，那时河南正在批判纪登奎文革时期的错误，机关支部开会，要求每人都要发言表态，我是党员，而且事关我父亲，没有个态度也躲不过去。我说：“纪登奎的错误，别的事情我不了解。不过，文革期间他在河南工作时，确实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他这方面的错误，在很长时间内对河南的工作都有很不好的影响，我自己在基层工作时，就有这方面的体会，也听基层干部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我的发言表态，说不上“认识深刻”，要是在偏激狂热的文革时代，就这么几句话，恐怕是“过不了关”的。不过我这些话是诚恳的，出自内心。

2008 年 3 月 于北京家中

节录自作者《读书札记：〈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兼答张胜同志：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一文。

【口述历史】

“三二九运动”暗含对毛泽东的谴责

——李良玉教授访谈（节录）

时 间：2006 年 2 月 25 日上午

访谈者：董国强、伍蓉蓉、梅雪盈（美国）

访谈对象：李良玉

地 点：南京大学文科楼 416 室

[李良玉：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爆发时是初中生。1973 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南大历史系学习]

李良玉：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是一个初中学生，在江苏海安县的一个小镇上完中。大概到了1968年8月份，文革带来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了。许多学校停课，大量学生堆在社会上，不能继续升学，也没有什么正当的事情做，变成一个大问题。作为青年学生，我们当时还不明白面临什么考验，自己流浪在社会上，也不知道给社会造成什么问题，只是自己感到非常苦闷，不知道后面的路该怎么走。1968年春夏间，中央下达文件，提出“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边疆**），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来就把我们都赶到农村去了。

当时我是不想到农村去的，我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是一个基层小干部，当时还在接受审查。但没有办法，我最终还是被赶下去了，到离我家不远的的一个生产队去当农民。我在农村呆了两年多，从1968年8月到1970年12月。后来1970年12月县里厂矿企业招工，我被招工了，才离开插队的地方，先是参加县委组织的工作队，到一个离家比较远的人民公社去帮助当地整顿基层政权。从1970年12月工作到1971年春天。1971年3月，我被分配到到家乡镇上的红旗机械厂做工人，不过只是把工作关系挂在厂里面，到厂里拿钱，人并没有到厂里上班，而是在县政府工作。1973年夏天，我参加江苏第二届工农兵学员招生（第一届是1972年招生的），被南京大学录取了。从1973年9月到1977年1月，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就留在历史系任教至今。

伍蓉蓉：李老师，我想请您着重讲一下1976年3月25日历史系73级全班55名学生抬着花圈去梅园新村悼念总理的情况。

李良玉：这件事情的过程，我在《变动时代的记录》这本书中的那篇回忆录里写得很清楚，基本情况就是那样。我在这里补充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

1975年冬天，江苏省组织“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让南京大学中文、历史、政治三个系的学生全体参加工作队，去扬州地区的江都县农村帮助整顿基层政权。大批同学是12月初去的。我因为当时生肺炎，在学校医院里住院治疗，过了元旦才去江都。

当时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家都很反感，普遍不理解。那个时候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但老百姓对江青和张春桥他们很痛恨，对姚文元印象也不好。1973年以前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社会上传说他们有矛盾，许世友不买张春桥的账。不过回想起来，人们当

时对王洪文好像还没有什么恶感。他当时看起来年轻、帅气，报纸上不太抛头露面，很少发表什么意见，老百姓就不太了解他。

1976年1月6日周总理逝世后，很短时间内南京就有30万群众自发地到梅园新村去悼念总理。后来有小道消息传说上面不准悼念总理，大家都很气愤。周总理的崇高威望是在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树立起来的。当时国家很混乱，他顶住各种压力，任劳任怨地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小文革的消极影响，老百姓都认为他是一个好当家，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其实周恩来1972年就生病了，但中国的新闻传媒一直没有报道过，老百姓们也就不知道，所以现在一下子说总理去世了，群众的心理一时很难接受。在这个情况下，南京的大批群众就去梅园新村悼念总理。后来上面说不准去悼念总理，群众自然认为肯定是坏人从中阻挠。群众一想，林彪已经完蛋了，那现在进行阻挠的只有江青和张春桥他们，所以老百姓对他们非常痛恨。当时所有小道消息、政治谣言所传播的都是骂他们、嘲讽他们的话。我们这帮学生的思想情绪和当时社会上群众的思想情绪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从江都农村回来以后，不管怎么样都要去闹一闹。我们25日的悼念活动是从长江路过去的，后来数学系的同学则是绕道新街口过去的。因为当时官方不允许去悼念，所以我们的这个举动实际上就是在挑衅了，就是一场游行示威了。

当时我们这个班去的时候，还没有造成游行示威的印象，但也很受社会上的注意。因为春节放假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去梅园了，现在一下子50多人抬着大花圈走过去，就很有影响。梅园新村的管理人员很快接到通知，就把大门关起来不准我们进去悼念。同学们不管这些，有一个同学从墙上翻过去，把大门打开，大家一下子就冲进去了。其实这次活动悼念是假，挑衅是真，是想借悼念故意挑起政治事件。说实在话，当时我们反“四人帮”没有什么新思想，没有提升到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思想高度，只是感觉这个社会太黑暗了，必须放一把火烧一下才痛快。

梅雪盈：那个时候，你们同学之间会谈论这些问题吗？

李良玉：我们经常讨论。因为我们当时看到的社会黑暗面太多了。我可以把我个人经历的情况告诉你。

《变动时代的记录》这本书里的那篇回忆录你们看过吗？就是那篇《一张老

照片和四个知青的故事》。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我很快就发现问题了，当时就感到有许多事情无法接受。比如学生出来斗老师，我是不能接受的。我的班主任王美老师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平时对学生非常关心爱护，但是文革初期就有学生贴她的大字报。当时挨批的老师还有很多。这个我不能接受。这和我从小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包括社会教育不符合。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做法的。

第二个不能接受的是我自己家庭的遭遇，我的父亲挨批斗。他是我们镇上第一个受到公开批判的干部，罪名是“地主阶级出身”和“走资派”。我当时难以理解的有两点：第一我们家不是“地主”成分。我的曾祖父在我们那个镇子上算是有钱人，但是大约在抗战前就破落下去了，我祖父他们分家的时候只分到债务。因为没有办法生活，祖父就在镇上摆摊子卖东西，祖母回东台县乡下娘家种地接济生活。土改的时候，我的祖母分了八亩八分地，定的成分是“贫农”。合作化以后祖母一直是生产队养着的“五保户”。我父亲怎么成了“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呢？第二，我的父亲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走资派”。他是我们镇上的一个基层干部，做一个厂的党支部书记，下面管五六个小厂，是个很小很小的干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当权派”。1964年“四清”运动中反复清查，没有查出他贪污一分钱。他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呢？

我父亲是解放后参加工作并入党的，他的特点——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工作狂”，成天在外面忙，从来没有休息日。他在群众中的口碑还不错，从不搞“多吃多占”。当时干部们能捞到的好处很有限，除了贪污，“多吃多占”是常见的一条。所谓“多占”，就是拿一点公家的东西，更多的是收受老百姓送礼；所谓“多吃”，就是接受群众请吃。我父亲当时有个说法在当地很有名，这可能得罪了其他干部。他说我当干部有三条原则：第一是“领导不吃群众”，第二是“上级不吃下级”，第三是“老子不吃儿子”。头两条容易理解，什么叫“老子不吃儿子”呢？他说：我在外面工作，如果“多吃多占”吃出问题了，犯了错误了，就会对子女有不好的影响，就是把子女的前程吃掉了，这就叫“老子吃儿子”。所以他主张“老子不吃儿子”。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把他搞出来。他被揪出来后，我就变成“走资派”的“狗崽子”，不能参加革命了。

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打开当年的报纸看看，肯定都是说全国人民如何热烈拥护毛主席关于“上山下乡”的指示，知识青年是如何兴高采烈地奔赴

农业生产第一线、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等等。我不知道上海、北京的学生是不是抱着那样一股革命的理想和激情，但我知道我们不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就全国的情况看，当时的那些宣传说的大多是假话！

我下乡的时候，一方面是镇上开欢送会，敲锣打鼓地往外送，表面上十分热烈。另一方面在我家里，我的祖母和母亲都在号啕大哭，祖母都哭得晕过去了。我过去从没看到母亲哭过，这次她也哭得死去活来。祖母和母亲都是从乡下来的，她们知道乡下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们老家旁边有一个生产队，有一年的劳动单价是一个劳动日 0.8 分钱。一个农民在田里干了一天活，还拿不到一分钱，这样的收入怎么维持生活呢？她们一辈子辛辛苦苦，好不容易从乡下来到城里头，就是巴望他们的后代不要再当农民了，不要再吃农民的那个苦了，现在我好端端的一个城里小孩子又要被送到乡下当农民去了，他们怎么能不哭啊！她们管不了是不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她们看得很现实。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祖母和我母亲哭的样子，多么悲惨，多么凄凉，令我很震动。

后来我在乡下，也想一些更深一点的问题。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自己好端端的要来农村种田？为什么我不能在城里头闹革命？当时我就对毛主席的那个说法很怀疑，他说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就想，要革命，要当无产阶级接班人，为什么非要向农民学习呢？农民不是“小资产阶级”吗？让“小资产阶级”教育一下就能当“无产阶级接班人”了？这在逻辑上不通嘛。毛主席还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的”，那么城里就没有“大风大浪”吗？没有“阶级斗争”吗？我为什么非要到农村去搞“阶级斗争”呢？为什么只有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才能“经风雨、见世面”呢？这个我就很不理解。

我到乡下的第一天下午，我们生产队揪斗一个“叛变分子”。他当时是大队的一个干部，被抓过来挨斗。全队的农民坐在广场上面，派几个人到他家里去，把他从家里揪过来。我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真正参加过批斗会。以前我父亲给人批斗的时候，我不愿意到场。每次斗争我父亲的时候，在我们镇上一个很大的剧场里开会，外面很远都能听到会场里喊打倒他的口号。我怎么有心思去看斗我父亲呢？不敢去，也不愿去！所以我没有参加过批斗会。结果到乡下以后，第一天就看到批斗会了。看了我感到非常难受，心里很不舒服。

接着 1969 年就搞“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公社的“学习班”就在我们生产队边上不远的地方。“学习班”办了不久，就传出有人自杀的消息。在这个期间，我老家镇上的一个邻居也上吊死了。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一笔糊涂账，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也搞不清。

董国强：凌志军在他的书中提到过，估计在 2000 万人以上。

李良玉：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景象，当然不能同意这些东西了，这跟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很不相同。如果革命革成这样，搞得老百姓们都家破人亡，这种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当时不懂什么理论，但是看到这些事情后很不理解，不能接受。进入大学以后，读了很多的书，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了，那就有判断能力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们进入南京大学读书时，学生叫“工农兵学员”。大学停办了许多年，大多数知青还在乡下劳动，而我们成了大学生，自己很兴奋，社会上也很看重，读书的热情还是高的。我当时对中国古代史很感兴趣，《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等，我都通读过，还做过卡片，做过笔记。临毕业时还借了《唐史》来读，但是没有读完，一是没有时间了，二是借的不是校点本，看起来很慢。外国的东西也读了不少，包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邱吉尔的《战争风云》，还有苏联编的多卷本的世界史等等。这些东西看多了，对文革的认识开始发生整体上的转变。如果说过去还有一点相信，或者说还只是局部的怀疑，现在开始彻底的怀疑了。

我对毛泽东的怀疑是从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开始的。“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开始是在党内流传的。后来好像是 1972 年春天，中央文件正式传达下来了。1973 年就在全国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1973 年 7、8 月间，县里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传达给群众，传达内容包括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现在有人说这封信是伪造的，是张春桥伪造的。

1972 年在党内传达“九一三事件”时，是要求保密的，不准向群众透露。当时我在县委机关工作，因为不是党员，所以没有听到传达。我们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与我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一天晚饭后我们一起去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们国家出了大事，党内出了大事，林彪出逃，已经摔死了。”我听到这个消

息后很震惊。文革期间一直宣传说林彪是毛主席定的副统帅、接班人，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后，人们自然就会对毛主席的正确性发生怀疑（不过现在看来，林彪在文革期间很少抛头露面，很多东西可能也需要重新认定，重新研究）。

另外，我们在文革期间还看到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例如 1974 年学校组织我们进行“开门办学”，去井冈山老区，路线是南京—武汉—长沙—萍乡—井冈山，沿途看到江西省的社会经济状况一塌糊涂，工厂不生产，老百姓很穷，省会城市南昌夜里都没有电。

1975 年底我和南大同学到江都去做工作队，我们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的群众穷得难以想象。当时农民穷到什么程度呢？到腊月里头，许多人家揭不开锅。生产队长来跟我商量，说能不能把田里的胡萝卜和山芋挖出来分给大家吃？当时生产队专门留下一块饲料田，种了一些胡萝卜和山芋，原来是准备拿这个东西喂猪的。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不下来：如果把这些东西分给农民吃了，那么猪就没有东西吃了。你看看，都困难到这个程度了！

那个生产队里有一个群众，他的名字叫潘咬脐——我猜想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因为请不起接生婆，是自己咬断脐带把他生下来的，所以叫这个名字。他当时 40 多岁，住的房子大概 10 平米大小，墙是泥巴垒起来的，上面盖的是茅草，一扇破烂的门很矮，要把头低下来才可以进去。里面是一张木板搭起来的床，床上一床烂棉花胎，没有被面子，也没有被里子。烧饭是自己垒的土灶，就在屋里面烧火，烟熏得房子里整个都是黑的。屋子太小，搁不下两张床，他和他母亲就睡在一张床上。当然这种人娶不起老婆，也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当时我没有钱，买不起照相机，如果当时把这个照片拍下来的话，会很有历史价值的。

我是在偶然的情况下知道这个事情的。有群众向我反映说这家很穷，我就到这家去看了，结果大吃一惊！我怎么也不能想象，现实生活中农民会穷到这个程度！按照我们过去接受的“忆苦思甜”教育，这种景象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才会发生的啊！这个事情对我的刺激很大。我当时很恼火，马上通知把所有的队干部叫到他家来。那些干部来了以后，我对他们说：“你们大家都来看一看，你们当干部就当成这个样子？有人家这么穷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怎么不摸摸自己的良心想一想？”我当时非常愤怒，讲话的语气非常严厉，难怪当地的干部们恨我。

生产队的干部们都喊我“老李”，其实我才二十几岁。虽然他们知道我是个学生，但我是省委工作队，是代表江苏省委的，狐假虎威，他们自然有点害怕，看到我都毕恭毕敬的。

我在那里当工作队，每年年终县民政局会给他们发一笔救济款，以前这笔款子全是他们几个干部私下里分掉了。这次他们来问我：“老李，今年的救济款怎么分？”我问他们：“往年是怎么分的？”他们说：“往年不讨论，就是我们几个，加上县里几个家在我们这里的干部，大家分分。”之所以要给那些家在当地的县里干部分一点，是因为要和他们拉关系。我说：“这不行！救济款嘛，顾名思义就是哪一家有急事，出了天灾人祸，就救济哪一家。如果大家都没有急事，那就救济贫困的家庭。干部们一分钱也不能拿！”他们说：“我们县供销社主任的家住在我们生产队，我们今后要找他办事的。”我说：“那就用别的办法报答他，这个救济款不能给他，他们家不穷，现在还买了砖瓦堆在那里准备盖新房子，救济他干嘛？”

进行年终分配时要开会讨论生产队干部的工分补贴。生产队的干部一般是不劳动的，队长、副队长、会计都不用劳动，因为他们是生产队干部。但是他们又不是国家干部，没有工资拿，他们的收入还是要靠生产队的分配。所以每一年年终分配的时候，队委会就要开会讨论给他们每人补贴多少工分。往年都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定一个补贴标准，补贴的工分很多。我当然不会同意他们这种做法，因为这不公平。如果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缓和一点。当时年纪很轻，血气方刚，爱打抱不平，有杀富济贫的那种感觉，想为群众说话。农民们太穷了，那么穷还得额外养这些干部。我当时就想办法要整整他们。我拿出中央文件，就是1962年公布的《人民公社六十条》，那里面讲到生产队干部的工分补助不能超过当年全生产队群众总工分的5%。我对他们说：“中央有文件规定的，要按照中央的文件办。你们去算算，你们该拿多少。”这下子他们就很难过了，因此很恨我。当时经常开三级干部大会（生产队、大队、公社），我们是省委工作队，也去参加。结果就听到他们私下里跟别人发牢骚说：“我们现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董国强：我打断一下，您刚才说到农民贫困的情况，很细致、很形象。那么当时干部的情况呢？你说的干部特殊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良玉：在我到的那个村子，你一走进村子，分化就非常明显。凡是房子漂亮气派的人家都是干部，有个说法叫“鹤立鸡群”，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反差。另一方面是贪占。当时有个习惯做法叫“三支一荇”。“三支”是指“预支、超支、借支”。农民们都是年终按工分算钱，干部不一样，没钱用了，可以利用权力预支多少，结果是预支的钱远远超过他年终应该得到的钱。那么什么是“一荇”呢？比如一个干部今天要到南京去办什么事情，打个条子提款 1000 块钱，结果回来报账，500 块钱发票交掉了，还剩 500 块钱不上交，就挂在那里。一个生产队往往几千块钱就挂在那里。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后来上面专门发文清理“三支一荇”，但清不下去。这些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看不到的偷偷摸摸的东西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中国的贫富差别、阶级差别从来没有消灭掉，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差别的程度大小而已。

董国强：您讲的这种情况当时很普遍吗？

李良玉：很普遍。但是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非常苦。我们看到这些社会黑暗、不公正的现象，所以很郁闷，也很愤慨。当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只是凭着青年人的正义感。

董国强：您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在文革期间，政治运动不断；另外一方面呢，您说您在那一段时间读了很多的书。同学中像您这样读了很多书的人多吗？

李良玉：不很多，为什么文革以后许多工农兵学员在教学岗位呆不下去？就是因为读的东西少了。我从小不喜欢政治运动，也不喜欢体育活动，就喜欢读书。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因为我对文学作品很感兴趣。像许多古典名著，我在小学五、六年级就读得不少，包括《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红楼梦》、《水浒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等。

大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老师。我跟历史系很多老师结下深厚的友谊，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举两个例子。

我当学生的时候，晚上经常到陈德芝老师家里去聊天。因为他接触到的东西很多，一坐下来他就发牢骚，他就骂北京的“四人帮”，骂文革，骂那些“左”的政策，因为知识分子不满。1975 年胡耀邦在社科院搞整顿，批什么“五子登科”，也是他告诉我的。他是老师，他的看法直接地影响到我们。

我们系里还有个老师叫姜平。这个人非常正直。1975 年底中央号召“反击

右倾翻案风”，他对此很反感。他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写好后还把我喊到他家里去，征求我的意见。那篇文章当时肯定是不发表。他研究巴黎公社，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讲的。巴黎公社的原则中有一条，政府官员的工资不应超过一个熟练工人工资的三倍或者几倍。他说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现社会平等。现在看来这不一定是最新的东西，但在这个旧形式下他有他特定的用意在里面。他当时征求我的看法，我没有多说什么，很婉转地说这个问题理论性太强了。我当时隐约地感到，我们的现实问题是一片混乱，不能用那个巴黎公社的原则解决问题。

后来 1976 年初姜平老师又写了一封匿名信，寄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请江华动员叶剑英、邓小平用武力把“四人帮”抓起来。他事后告诉我，他去寄信的时候，穿了件军用雨衣，还特地跑到城南的夫子庙邮局去寄的。这封匿名信很快落到公安机关手里，被列为“特大反革命案件”之一，南京市就进行排查。查来查去，就把夫子庙邮局那个当班的邮递员排查出来了。邮递员回忆说：寄信的人 50 岁上下，身体比较胖，穿着一件军用雨衣，像个干部的样子。后来还大规模地查对笔迹。不过最后没有查出来。估计一个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灾难，结果全国各地草木皆兵，纷纷都忙着防震。另一个可能是因为“军用雨衣”这个细节，有关方面把排查的重点转到南京军区去了。当时社会上都传说许世友跟张春桥水火不融，南京军区的干部们也很恨“四人帮”，所以后来就重点在南京军区进行排查。

粉碎“四人帮”以后，姜老师跟我说，他当时谁都没有告诉，包括他的妻子。但是他悄悄地把牙膏牙刷和换洗衣服都整理好了，如果万一被逮到，随时准备去坐牢。我笑着对他说：“如果逮到你就完了，肯定要杀头的！”

所以说当时南京大学的老师们的身上还是有知识分子传统的。这个传统很自然地对学生有影响。当时外界都说南大像个“自由市场”。这在当时是一个负面的评价，但是现在看看则表明南大人确实具有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董国强：我前一阵子跟蒋广学老师接触了一下，据他说，南大大部分师生对文革产生幻灭，是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那就是在 1970、1971 年前后。南大的氛围确实跟外界不太一样。

李良玉：不太一样。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文革期间的地下刊物，包括广州“李

一哲”的大字报，当时也有很大影响。“李一哲”的大字报我有抄本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当时南京还有一个叫徐水良的，在新街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当时也很震动。他是南京制药厂的工人，后来也抓进去了。文革结束后听说他到了国外。不过我觉得最有分量的还是“李一哲”大字报。“李一哲”的东西影响非常之大，当时没有复印机，大家就拿复写纸传抄，我手上有一个原本的，很可惜没有保存。我还曾把它带回老家给人家看。所以那些东西对群众的思想转变有很大的启蒙作用。其实中国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官方对这些东西正式表示认同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董国强：徐友渔也说，后文革时期中国的思想启蒙是在本土完成的。

李良玉：就包括我个人的想法。我现在还保留了当年的笔记本，上面记的一些东西就有反映。当时人们对那些“左”的东西非常反感，后来到“四五运动”是一个总爆发，就是社会深层的东西已经浮现出来了，已经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了，而是许多老百姓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当时大家说“悼念周总理”，“我们深切怀念杨开慧同志”，实际上就是对江青不满。我们“南京事件”有很明确的口号要打倒他们。不过当时多数思想、口号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比较陈旧的。因而“四五运动”的这个总爆发还是一个体制内的总爆发。现在的研究还是应该把这个社会底层的思想变迁的过程搞清楚。这个很重要。

董国强：我现在的总体设想就是这样，就是想通过社会史的视角，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普通成员的思想状况进行考察，来揭示社会底层思想的变迁。

李良玉：我们同学中还有过一次带有理论意义的争论。当时有一个提法叫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的观点是思想领域、意识形态方面的专政是不可能的。为此我跟几个同学争论了一个晚上。我始终认为这个提法是不正确的，对思想很难专政。比如说我有这个思想，你怎么对我专政？除非把我消灭掉！其实现在看来上面那个提法是非常专制主义的。我想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剥夺个人哪怕普通人的思想。人们可以不反对社会，不反对国家，但可以有不同意见。对思想专政是不太可能的，无法把思想消灭掉。我认为我们当时唯一可以提到思想意义上的认识就是这一点。

伍蓉蓉：您刚才讲到1975年参加省委工作队，是不是选派一些学生下去的？

李良玉：不是的，所有文科的学生都下去。可能是江苏省委认为，南大文科学生总给他们找麻烦，所以把我们统统赶下去。

开头找麻烦的是政治系的学生。林彪没有倒台以前，叶群发动手下人在全国范围为林立果选老婆——当时叫选“妃子”，他们到江苏来的时候，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蒋科负责接待的。他进入省革委会之前好像是省军区的副司令。林彪倒台以后，这个事情被捅出来了，学生们就把蒋科弄到南大来批斗。实际上这件事情可能有更深的背景。政治系有学生告诉我，当时经常有省委的人夜里来找他们，可能是为他们出主意。这事闹了很久，最后把吴大胜也搞下去了，彭冲当了一把手。

南大的学生还故意找碴。当初我们进校时规定学制是三年，后来弄了三年半，因为要补半年文化课。这个补课的时间在学制里没有。借这个事，南大二三千学生去冲击江苏省委，闹了一夜，要求提前半年毕业，当时叫“砍尾巴”。“四五运动”期间贴大字报，有人贴了一张“大参考”，就是这时候从省委的一个办公室里弄出来的。当时这个办公室里没有人，有同学进去刚好看到这个大参考摊在桌子上，上面有一段内容是关于“伍豪事件”的。后来要揭露“四人帮”反周恩来的阴谋，同学们就把这个东西贴出来了。

所以很可能江苏省委对南大文科的学生很不满，就借“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把这些学生统统赶到乡下去了。

董国强：当时工作队是怎样构成的？

李良玉：由两部分人员组成，省委机关干部和南大学生。一般到公社一级是一个工作大队，大约几十个人。到大队一级是一个工作小队，大约七八个人。到生产队一级就是一个工作组，有的生产队就派一个人去。我当时跟另一个苏州同学，两个人分管福舍大队第四生产队。

伍蓉蓉：你们作为省委工作队的人下去不用干活吗？

李良玉：是的，不干活，我们的任务就是整顿农村基层政权。

文革期间我经常干这种工作，一共干过三次。1968年底干过一次。那时我还是刚下去的知青。当时叫“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就是工作队，任务是整顿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恢复党支部，恢复大小队干部的工作。这个宣传队里十几个人，我现在还有一张“宣传队”解散时的纪念照。1970年底

招工后干过一次，1975年又干了一次。

我插队的地方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统区和共产党根据地的缓冲地带。文革前这个生产队的队长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做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社长，后来人民公社时期做过大队干部。文革期间一帮农民要夺权，就找了当地一个“历史反革命”来检举他，说他曾经自首过。

什么叫“历史反革命”呢？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一项罪名，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保长”以上干部，军队里“连长”以上军官，城市里的警察、特务，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农民造反派找来的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抗战前在上海的码头上做工。他跟日本人打交道多了，会说几句简单的日语。后来“八一三”上海打仗，他逃难回老家。再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家乡，看这个乡下人还会几句日语，就让他做伪保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军队来了，他就接着做国民党的保长，所以解放以后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另一派农民要打倒生产队长，就组织造反派殴打这个“匪保长”，叫他去咬那个老党员、老生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个缓冲地带，共产党来了，那个“匪保长”不敢呆在根据地，就躲到我们的老家镇上国民党的据点里去了。他后来就交代说有一天在镇上看到过那个老队长。造反派就去质问那个老队长，那里是国民党统治，你跑国民党的据点里干什么去了？你不叛变自首怎么能出来的？你被那个匪保长看到了，你怎么能出来？于是老队长的生产队长就当不成了，由另一派掌权。后来“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作为“自首变节分子”又被清理，据说在“学习班”上被挂牌示众。

工作队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在内部讨论是不是要给老队长平反。我力主给他平反，做了很多工作，大家接受了我的意见。

那么要给老队长平反，就要找他谈话。因为怕介入到矛盾里头，我去找老队长谈话的时候，都是在夜里。当时没有电视看，农民们老早就睡了。我们要把老队长“解放”出来，他还不愿意。一些干部争着要“解放”，可他不愿意。他说：“我不干了，我给党工作，几十年都搭在里头了，最后落成这个样子。”最后我们还是把他“解放”出来了。

跟老队长谈话以后，还要去找那个“匪保长”谈话。因为是他提供材料证明老队长自首的，所以现在就要去找他，问他这个材料是怎么弄出来的，要他本人

站出来否认原来的证词，这个案子才能消掉，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天安排我和工作队里面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姓杨，是另一个生产队的民兵排长——去跟“匪保长”谈。当时我正在整理一份材料，我就对那个小伙子说：“老杨你先去找他谈，我随后就到。”我认为这是一件小事，老头被造反派逼着做了一个伪证，现在去核实一下不就完了嘛。哪想到这个姓杨的小伙子非常简单、粗暴，他老兄跑到那个匪保长家里去，把绳子往地上一摔，说：“你们要好好交代，把事情说清楚，否则你们就过不了关！”这个阵式把老头老太吓死了，吓得他们跪在地上发抖。我坐在队部看材料，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不到场，让他一个人去，不要弄出什么事来。我马上把手上东西放下跑去了。结果就看到那个情景。于是我对老杨说：“队部有点事情，你先回去一下。”先把他支走，然后把老头老太扶起来，搬一个凳子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别害怕，先坐一下。”然后又拿他们吃饭的碗——他们家里没有茶杯——倒了两碗水，说：“你们先喝点水。”等他们缓过神来了，我才说：“今天来找你们，主要是要核实你们当初交的那个材料。现在你们要讲清楚，这个材料是怎么来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实事求是，把这个情况说一下就没事了。”他们说：“那是造反派叫我们搞的。造反派打我们，我们没办法。”我照这个情况把材料写下来，然后让他们按一个手印。我把这个材料送到公社去，说老队长的政治历史问题是逼出来的。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后来我招工了，再回到那个生产队去看看，这对“匪保长”老头老太看到我，还要往地下跪，说：“我们这条命是你给救下来的。”我赶紧把他们扶起来，对他们说：“不是的，我们只是为搞一个材料，你们当时可能太紧张了。老杨他可能粗暴一点，但是也不会害你们的。”现在这对老夫妻可能都死掉了，被我解放的那个老队长叫崔忠林，年纪大了，也死掉了。

董国强：当时工农兵学员的年龄大概在什么阶段？

李良玉：多半在二十二三岁。

董国强：经济状况呢？

李良玉：进校后国家有生活补贴，每个月 18 块钱。

董国强：有没有带工资的？

李良玉：有工资的就带工资。当时招生的原则就是“哪里来哪里去”。后来毕业

分配时，我们班上 55 个同学，除掉个别国家统一分配的和几个留校的之外，其余的都是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县里来的回到县里去，部队来的回到部队去。

董国强：工厂、部队来的是肯定有工资的，农村来的就没有了？

李良玉：有具体规定的，好像工作满三年的才可以带工资，像我就没有工资了。我从工厂来的，但工作不满三年，没有工资。部队来的是有工资的，农村来的不论多少年都没有工资。

董国强：国家每月给您 18 元的补贴，这笔钱够用吗？

李良玉：够用。生活费大概一个月 8、9 块钱就可以了，吃得还不算差。所以有这个补贴，包括零花钱、来回的路费都够了。我记得当时家里也给一点钱，开始每学期父亲给我 40 块钱，后来涨了一点，给我 50 块钱。但每次回家我都买很多东西，实际超过这个数。

董国强：当时社会上一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怎么样？

李良玉：南京我不清楚。在我们那地方，工厂里头多数人在 36 块钱上下，超过 40 块钱的工资算高的，很高级的技术工人才能拿到 44、45 块钱。我父亲文革之前的工资是 49 块 5 毛钱。在我们那个镇上，他的工资一直是最高。因为他的工作一直比较积极，所以每次加工资都给他加。那时 49 块 5 毛钱可以维持我们一家八口的生活，不是很好的生活，但能维持。

我 1970 年招工，1971 年 2、3 月份分配到工厂里，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学徒工的工资，18 块钱。当时拿到 18 块钱很激动！现在很难想象那个幸福感，因为这标志着我的身份转变了，又回到我的家乡来，又回到我的镇上来，又变成一个城市居民了，不再是农民了，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我不是轻视农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坚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我的价值不是当一个农民。我在农村最艰苦的时候，都始终坚信我不可能一辈子做这个事情，我肯定不会在这里当一辈子农民。所以现在我带学生时，经常跟他们讲，人生要有信念。你的信念是什么很重要。很多人一念之差就消极下去了。比如我们知青，有的人一念之差，就找个农村姑娘结婚，这样后来就很麻烦。我当时咬紧牙关，坚决不找农村姑娘结婚。

另外我在农村时一心要读书。白天跟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回家就读书，想学着写文章。当时报纸很多，有《新华日报》，有南通地委机关报《新江海报》等，

我就写文章往《新江海报》投。开始不知道怎么写文章，一个十八、九岁的普通知青，初中毕业生，想在报纸上登文章是很难的。于是我就拼命地看报纸，揣摩文章该怎么写。投一篇退回来了，我不气馁，再写再投。这个磨练的过程很艰难，当然也有好处。后来我终于连发了两篇稿子。一篇刊登在1970年5月29日《新江海报》第二版，是以我的名字发表的，题目是《向贫下中农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这是报纸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专栏的文章，大约900个字；另一篇刊登在1970年7月3日《新江海报》第二版，是以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饲养员杭元坤的名义发表的，题目是《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是报纸办的学习“九大”新党章专栏的文章，大约800个字。

到现在我还收藏着刊登我文章的那两份报纸。现在把这两篇文章拿出来看看，有些东西很有时代色彩。其中前一篇稿子写如何学习《讲话》，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后一篇讲杭元坤如何学习新党章，安心做好饲养员工作。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发表，自然要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说假话。我从来没想到要在农村扎根干一辈子。我不想当农民。但是另一方面呢，一个知青，经过多少努力，自己的文章见报了，心里真是非常兴奋。

董国强：1973至1976年这段时间，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没有中断过，也出现了一些大事情，比如像“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等等，然后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对你个人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李良玉：“黄帅事件”我没有很关心。但是我对张铁生是恨之入骨！为什么恨呢？这个恨不是思想觉悟高，而是从个人立场出发的。因为经过他那么一闹，我的大学差点上不成。

1973年是我入大学的那一年，这是第二批招收工农兵学员，第一批是1972年。1972年江苏省招生没有经过考试，名额下到各个县以后，各个县里的头头脑脑们就分掉了。像我们那个镇上有一个名额，就给了县里一个文革前的副县长的女儿。干部下放劳动的时候，这个副县长就下放在我们镇附近，一家子去的，不过人下放下去了，工资照拿。而且他毕竟是文革前的副县长，我们那里比他大的官没有，所以1972年的指标就悄悄给了他女儿。

我对离开农村产生强烈的想法和冲动是在1970年夏天。那个时候我在农村很少回家。不过麦收的时候我实在太疲劳了，就想回家看看，顺便休息休息。有

一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正在往镇上走，后面赶上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也是我们镇上的一个知青。他看到我，主动下车跟我打招呼。于是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我就问他：“你今天也回家？”他说：“不是的，我今天是去办手续的。”我说：“办什么手续？”他说：“我招工了。”我一听吃惊了：怎么跟我一起来的，人家不“扎根”了，走了，跳到大城市去了！他当时招工招到南京军区后勤部，是一个建筑单位，部队建制，负责施工砌房子。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难过，人家都走了，我还在这里熬着！不过我回家后一个字也没有提。因为如果讲的话，家里人也会难过的。

到了1970年秋天，县里又下达招工文件了。大队里把知青集中起来开会，说招工有几个条件，要群众推荐，政治表现好，家庭政治历史清楚等等。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希望，也没太注意，因为我父亲政治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当时已经不在生产队劳动了，公社把我借调去搞一些文字工作。这个期间公社里面主管招工的干部，是公社党常委、团委书记。她当时主持招工，办公室就在我隔壁。有一天开会，8、9月份天气很热啊，门窗都开着。她不知道我坐在隔壁办公，她就在那里讲今年招工要什么条件，要政治表现好，要什么什么……她马上举一个例子，她说：“有的人表现不错，工作能力也很强，但不能招工，比如李良玉。”我在隔壁听到气死了，但又不敢说话。下班回家去，澡也不洗。家里人说：“这么热的天，你怎么不洗澡？”我说：“没出汗。”不过没过几天，她被上面撤换掉了，因为她犯了很多错误，生活作风也不好，是一个很糜烂的女人。公社内部开大会批判她，团委书记也当不成了，被调到兽医站去做会计。

后来换了一个老干部负责招工。他非常正派。当时我父亲的工作、政治问题还没解决，他就将我列入了招工计划。最后把政审材料拿到区里面去讨论，区里面一个主管的副书记说：“这个干部（指我父亲）我知道，他很有能力，很正派，他的儿子可以招。”这样才招工进来。

当时确实是对知青命运有种强烈的想摆脱的感觉。我坚信不会一辈子呆在那个地方当农民。刚下放的时候还有一点理想，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我文集里有一首词就是1969年写的。但是经历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感到非常苦闷，特别想读书。

1972年招考没有公开，没有考试，只是推荐，所以我们没有份。1973年招生有些不同了，当时就宣传，一方面强调政治表现要好，另一方面还要经过严格的文化考试。于是我也报了名，并认真进行了复习。

那年语文考试的作文题被我事先猜到，跟我一起复习的两个人都沾了光。考试前半个月他们来找我，说是想跟我在一起复习。有一天我们正在看书，很偶然地，我就产生了一个灵感。我说：“作文是肯定要做的，那么今年会考个什么作文题呢？我们要不要事先做点准备？”那两个人都说好。于是就猜题目，然后大家自己做。后来考试的时候，作文题叫“一件难忘的往事”，真被我猜到了！考试卷子发下来，我一看真是欣喜若狂，赶快把预先写好的作文写上去。由于有准备，自然做得又快又好。我们南通地区招生领导小组的组长好像是苏州大学（当时叫苏州师范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主任，他看了我的卷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候招生不需要填志愿，就由县里讨论，将录取的学生分配到各个学校去。开头把我分在南通医学院，我不愿意。我就去找领导，我说：“医生的工作很高尚，能解除病人的痛苦，但我做不了。医生要成天跟病人打交道，每天面对的就是血啊、棉花球啊、痰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我受不了。”他说：“这是县里常委讨论决定的，不可以改变。”

但是县里确定的招生方案还要拿到地区去讨论，由地区招生会议最后拍板。在地区讨论时，有人说：“海安这个李良玉送去学医有点不对口，这个人要送到名牌大学去读文科。”所以地区的招生会议最终决定把我调剂到南京大学来了。

“命运”这个东西有时是说不清楚的，他的一句话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接到录取通知时我又开心又纳闷：不是说好到南通医学院的吗？怎么到南大了？

就在1973年县里确定了招生名单之后，报纸上公布了“张铁生事件”。就因为这个张铁生，这一年的招生录取工作被推迟了。好像上面还有通知，各地要对招生名单重新审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考试成绩好但政治表现不好的被录取了，而政治表现好但考试成绩差一点的被卡掉了。这个新精神实际上对那些文化考试成绩好的考生构成严重威胁。我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很害怕被刷下来，所以对张铁生很痛恨。

“张铁生事件”出来后，县里招生办公室重新开会讨论。果然有人专门提到我，说李良玉虽然各方面都不错，但不是党员，要不要把他拿下来？这个时候，

县教育局一个主持招生工作的副局长说了一句，他说：“这个人就不要讨论了，他又不是去省委党校学习，不需要是党员。”一句话就 pass 过去了。他叫王敬吾，早就退休了，他也对我的命运有很大影响。

所以我对张铁生的恨，完全是出于个人立场。除了这一点以外，我对这种做法也没有好感。读大学嘛就是要读书，你不读书，没有文化知识，考试交白卷，怎么去读大学呢？

与张铁生类似的笑话，我们县里也有。在县里文化考试完了之后，曾经开了个座谈会，推荐来考试的有不少政治表现好的知青，我们邻乡就推荐了一个。他当时 30 多岁了，小学毕业，在生产队养猪，年年是劳动模范，公社就把他推荐来参加考试，结果一窍不通。我很不赞同这个做法，始终不赞同，读大学总应该能读书才行吧？！

董国强：关于“南京事件”的过程，您还有什么要谈的吗？

李良玉：“南京事件”的过程我就不说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先后写过三篇文章，一篇是《难忘的三二九》，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78 年第 2 期上；一篇是《回忆 1976 年南京“三二九”运动》，收在我的文集《变动时代的记录》里，我们几个当事人写的检查交代材料也附在这篇文章后面；一篇是《对“1976 年南京事件始末”一文几个重要史实的订正》，发表在《百年潮》2003 年第 9 期上。这是为了纠正这份杂志上一篇文章的错误而写的，发表之后没有受到批评，说明我的纠错是对的。这几篇文章把运动的过程基本说清楚了，你们可以去看。

董国强：那么您可以谈谈“南京事件”被镇压以后的情况吗？

李良玉：可以的。“三二九运动”很快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南大抓了三个人，即秦峰（数学系学生党支部书记）、李西宁（数学系团总支书记，身份是老师）、康育义（地质系老师），另外就是在学生中间进行大规模“清查”，就是说清楚问题，追查谣言。南大的“清查”并不认真，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我记得暑假前学校就宣布解脱参与运动的同学。我当时在苏州东山毕业实习，系里面专门派人下去宣布的。抓走三个人与学校无关，是公安局抓的。当时的党委书记周林是 1975 年邓小平起用的干部，副书记章德本身受到牵连，所以学校领导班子里对这个事情不是很积极。从社会上来看，“四人帮”确实不得人心，抗议活动虽然被强压下去了，但是整个社会心理依然处在对抗状态。好在 10 月份

“四人帮”就给搞下去了，否则可能还会有事。从学校内部看，南大碰到这类政治问题，保护学生、老师还是有传统的。而且那么多人卷在里面，真正要抓也是很难办的。

董国强：您能否谈谈“四五运动”的意义？

李良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许现在谈还嫌早。我个人感觉，“三二九运动”不单反映了南京大学师生对文革的抗议。在这前后，反对文革，憎恨文革，憎恨极左思潮，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各地都有一些借悼念周恩来挑起事端的事情发生。所以，南京的“三二九事件”和后来北京的“四五运动”只是全国人民情绪的集中发泄。“三二九运动”和“四五运动”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它和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运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进步运动一样，代表着知识分子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文化复兴的强烈要求。“三二九运动”公开反对的是“四人帮”，但是实际上是对整个文革左倾路线不满。在“三二九运动”中，包括后来的“四五运动”中，虽然人们除了声讨“四人帮”以外，不可能公开反对或者声讨其他人，但是人们对毛泽东的怀疑、失望已经非常明显，事实上运动也暗含对他的反感和谴责。群众认识到“四人帮”的反动，同时也认识到“四人帮”是得到有力支持的，认识到文革极左政治和思想的根子比“四人帮”更深。这是后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粉碎“四人帮”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甚至也是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

站在这样的高度，我们对“三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的认识，就可能要更全面一些。

【文摘】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

武丽丽、赵鼎新

对于文革的发生和发展的解释，很难忽略毛泽东的独特作用。文革是由毛一手发动的，只有毛才有能力打破各级党委的控制，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也只有毛才有能力在文革的各个关键时刻不断改变其航向，驾驶着中国这一左冲

右撞的巨轮，直至其去世。毛虽然有能力和威望，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其动态，但是他却没能使文革向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文革中各级党委被打倒，但是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更为廉洁的政权；被发动起来的百姓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但是大多数人却把这种自由用于整人和派性斗争。在毛去世时，中西方所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都完全被边缘化，置对方于死地的恶性权力斗争成了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国人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十年文革的确是一场浩劫。

本文从 1966 至 1968 这三个关键年份银川地区的文革入手，试图阐明以下问题：为什么以毛的能力和威望，他只能发动而不能控制文革？文革发展形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文革必然会把中国迅速地引向灾难？宁夏地处西北且不属于一个重要省份，人们可能因此会对银川文革的典型性问题提出质疑。事实上，从本文的讨论中可看出，银川文革与其它地区相比，有着十分相似的问题和发展阶段。此外，中共对银川文革的表态较一些重要省份来说有着一定的滞后，这就给了银川的地方官僚势力和群众组织更多的活动空间。本文将从毛泽东的“克里斯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国内一般译为“卡里斯玛”）、地方官僚和群众组织这三者的关系入手来解答以上的问题。银川地区的文革对以上问题来说是一个合格的素材。

一 分析框架

韦伯提出的“克里斯玛权威”和“例行化”（routinization）是本文的两个核心概念（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trans. Ephraim Fischoff et al.,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111-48), 有必要作简要说明。“克里斯玛权威”指的是建立在个人超常质量和其所体现的特定使命信仰基础上的权威。韦伯认为，“克里斯玛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科层权威”（bureaucratic authority）或“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取代，这就是例行化或制度化。在韦伯看来，“克里斯玛权威”和任何例行化权威，特别是“科层权威”，是根本对立的。这是因为“克里斯玛”本质上是一种反日常结构和日常工具理性的力量，而后两

者则是“科层权威”的特征。韦伯的论点是建立在理想概念（ideal-type）基础上的，而现实政治的权威基础往往是混合型的。毛时代中国政府是由“克里斯玛”型领导（毛）和其控制下的科层机器（各级党政军机关）组成。毛的“克里斯玛权威”及其意识形态构成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科层体制则是毛统治社会的必要工具，而这科层体制的权威来自毛的“克里斯玛权威”的“例行化”。

“克里斯玛”是个人性权威，而科层是制度性权威。科层运作需要规范和程序。这种对于可控性的追求势必使科层运作变得制度化、例行化和趋于保守，与“克里斯玛”型领导的激进性形成紧张，并会在无形中削弱“克里斯玛权威”。历史上，“克里斯玛”型领导一般都会在其有生之年对“科层权威”采取限制措施，以维护自身的领导（对这种“克里斯玛”形态的分析可参考 Arthur Schweitzer , *The Age of Charisma* [Chicago: Nelson-Hall , 1984]），但是他们并不试图彻底改变“克里斯玛”的“例行化”倾向，因此“克里斯玛”型领导和科层之间尚能共处。但是毛泽东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文革前，毛与科层之间的各种冲突，比如毛偏好命令型经济（“克里斯玛”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运用）而科层追求理性计划经济，最后往往以毛在实践上的失败而告终；毛同时也对中国革命在科层领导下的迅速例行化十分不满。这就造成了毛的个人权力失落感和对其所依赖的科层的革命性产生了怀疑。从本文的视角来看，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想藉“继续革命”的方式来克服科层的例行化，从而保持他的“克里斯玛权威”及其意识形态的革命性。

科层体制的权威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化身毛泽东本人。因此面对文革的冲击，中共的巨大科层显得非常无力。正如文革前毛与刘少奇在一次争执中所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版 118 页）但是，毛发动文革却遇到了如下的困境：

第一，文革的斗争对象是科层体制，因此毛不可能依赖科层来进行这一场革命。他必须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但是，群众不可能是毛的意志的化身。他们有着在文革前与地方科层的恩恩怨怨，有着对文革的不同理解和对毛的不同忠心程度，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欲。因此，群众在文革中的行为与毛的希望大

相径庭。毛很快便意识到，由于群众的利益和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群众运动的反例行化特性，群众组织要比科层更难驾驭。

第二，虽然文革的对象是中共科层，但毛并不认为他参与创建和正在领导的党已经是漆黑一片。文革的目标是“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难题：到底谁是走资派？除了早就想除掉的刘少奇外，毛对于这一问题并不清楚。这就有了如下后果：科层中不同派系把对方视作走资派抛了出去；群众把自己憎恶的干部标记为走资派；群众组织头目和某些科层干部相互勾结，以打倒另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国于是成了一个霍布斯的世界，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自由的人们，在人人自危的状态下卷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

第三，中共的科层负有保卫和管理这一国家并为大众提供基本服务的责任。除非毛真的想“再次上山去打游击”，否则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他也希望国家的一些基本事务能得到处理，而这一愿望必须通过科层得到实现。这就是说，即使是在各级科层受造反群众冲击最为凶猛的时候，毛仍然需要依赖科层来管理这一国家。毛能把科层中的任何人打成反革命，但是却不能把整个科层一锅端。中共科层的国家机器功能给了科层一定的自主性。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毛中央的信息不灵和顾不过来，更由于毛有着种种投鼠忌器式的顾忌，各级文官和军事科层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混乱的派性斗争中，把文革的发展方向进行对自己有利的、有限的制度化或例行化。

毛的“克里斯玛权威”和以上的三个结构因素的耦合决定了文革的发生和发展：科层无法阻止毛发动文革，但是造反群众和各级科层却能在文革中把毛及其思想转化为合法性符号并对其进行挪用。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使文革有了独立于毛的意志之外的发展逻辑。毛可以在任何时候利用他的“克里斯玛权威”发出指示以改变文革方向，但是毛却无法阻止自己的话语被各种力量利用，将文革导向毛所不愿见的方向。于是，当毛觉得社会太混乱而发出向“右”转的指示时，科层势力抬头，造反派受压，社会走向保守的例行化方向；而当毛发出向“左”转的指示后，反例行化的造反组织就会抬头，科层势力受限，社会则走向混乱。文革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左右摇摆中变得日益不可驾驭。

在银川地区，这种混乱的加剧，迫使毛在 1967 年不得不用他最后所能依赖

的野战军军事科层来整合局面。但是，野战军一经起用后，其运作逻辑与传统科层相差无几：造反派受压、科层权威重新确立、一个新的例行化过程启动，毛最终败于一个被文革大大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沉重、派性斗争不断的科层权威手上。可以说，韦伯打败了毛。

以下，我们将以这一理论框架为指导，对银川地区文革的兴起和发展进行描述和分析。

二 工作组和保守红卫兵

——科层对“克里斯玛”动员的控制（1966.6-9）

银川地处边缘。当北京文革已发展得轰轰烈烈时，宁夏还在搞社教运动。宁夏区党委（本刊注：本文中的“区党委”均指自治区党委）把文革作为社教的延续。各单位社教团直接领导文革，他们建立黑名单，把黑五类和其他有历史问题的人，划成右类并进行批斗。

北京文革的消息通过报纸和电台传到了银川。1966年6月2日，在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影响下，宁夏大学的九名学生贴出了一张“检查我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状态”的大字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1925.8-1988.6》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版350页）。该大字报的内容纯属模仿，其策划人只是学生干部和积极份子，然而这行动却震动了宁夏区党委。依据惯例，区党委向宁大派出了调查组并对学生进行严密监控。同时，宁大组织学生对大字报的作者进行了批判，把他们定性为“反党份子”（第45号被采访人）。

6月4日，按照当时刘少奇所发出的中央指令，区党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银川各校领导文革。工作组将运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当北京高校领导被大量打倒时，宁大领导得以暂时免于此难。6月中，毛下令全国学校停课半年闹革命，宁大学生变得更为兴奋。18日，一张批判宁大党委书记江云的大字报出现在《宁夏日报》社门口。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一方面命令工作组迅速制止这种行为，另一方面明确宣称“江云不是反党份子，宁夏大学不是北京大学”。同时，他们

派江云到西北局开会以躲避冲击（宁夏地方文献馆收集《宁夏各种小报汇编》，银川，1967）。

宁夏文革工作组把运动的矛头指向教师和下层干部。6、7 月间，以宁大为例，83%的老师和下层干部遭到了大字报的批判，42%的教师和 59%的干部划为坏份子被批斗（宁夏地方文献馆收集《宁夏各种小报汇编》）。某些工作组还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银川一中高考准备班（高三班）的大部分学生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工作组把他们定为“资产阶级的小苗苗”加以批判。这种做法惹怒了班里出身红五类的干部。于是他们就在中央媒体舆论的影响下组织了“保卫校园”的反工作组行动。该行为被区党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学生们被遣送到郊区农场进行整风（第 40 号被采访人）。自反右运动后，各级党组织的权威成了神圣。它们从毛那里获得了制度“克里斯玛权威”，因此“进攻工作组就是进攻宁夏区党委，进攻区党委就是进攻毛主席和党中央”（第 40 号被采访人）。在这一例行思想影响下，地方科层对学生造反的自然反应就是镇压。这些文革初期的牺牲品大多数都成了以后造反派的骨干。

进入 7 月下旬，科层权威对文革的控制遭到了毛的批判。毛反复批评了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是犯了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并勒令撤销工作组。此后毛试图抛弃科层中介，以个人名义直接与群众发生联系。他的眼光投向清华红卫兵。毛写信盛赞他们的革命性，并把他们的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材料在会上颁发。8 月 9 日，在毛的操纵下，大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指出文革的主要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撤销工作组和通过十六条使群众感到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它的斗争对象不是群众而是党的领导阶层。8 月 18 日，毛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了红卫兵，从此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

然而，这一切并未彻底打破各级科层对文革的控制。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取得文革领导权的是宁夏区党委一手扶植的文革筹备小组。当然，迫于形势，区党委也改变了一些策略：他们为因反工作组而受压的学生平反，并抛出了与宁夏一二把手杨静仁和马玉槐不和的几位干部作为“宁夏区党委内的黑帮黑线”进行批斗，其中包括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吴生秀，区党委常委、政协副主席刘震寰

和文化局副局长杨辛（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1925.8-1988.6》351-352页）。

在区党委的控制下，银川成立的“红卫兵总部”只允许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参加，其头目也都是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的子女。他们热衷于“破四旧”，并对种种针对他们父辈的造反行为进行压制。十六条发布后，银川的工厂和政府机关里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反单位党委领导的行为，但是如同当时的学生造反一样，这些行动马上就被扣上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直至9月底，银川文革基本被控制在制度轨道内。

三 串联红卫兵和科层的失控

如果说毛与清华红卫兵的直接接触，是打破中共中央科层对文革控制的关键，那么毛发起由国家负担经费的串联，则是一个打破地方科层对文革控制的有效手段。在毛和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北京文革迅速朝毛的意图发展。但是在“天高皇帝远”的银川，地方科层却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将运动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串联开始后，北京的造反信息迅速扩展。北京红卫兵因其政治优越感，加上与地方上的权威没有任何关系，行为极为大胆：他们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地方的最高权威，帮助或直接组织了原本力量很薄弱的地方造反派，并为地方造反派提供了行为模式。

最早到达银川的是蒯大富手下两个出生于宁夏的清华学生。他们到达银川后立即试图在自己的母校建立造反组织（第21号和第42号被采访人）。8月下旬，一批来自北京第三十和五十五中学的红卫兵到达银川（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1925.8-1988.6》355页）。他们一进银川就把攻击宁夏区党委的大字报贴到区党委门前，并要求杨静仁出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是“毛派来的革命小将”，杨静仁只得亲自出来欢迎，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了谨慎的回答。北京红卫兵的行为在银川造成了极大的震动：银川极少数造反者的眼光还仅仅局

限于本单位的领导，北京红卫兵的行为使他们意识到连区党委都是可以挑战的。第二天，在北京红卫兵的指引下，本地学生开始在区党委门前贴出大字报，如“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要挖出彭真埋在宁夏的定时炸弹”、“杨静仁已经对北京红卫兵表示了支持”等等（第 42 号被采访人）。

大学红卫兵在政治上比中学生敏锐。通过北京红卫兵，宁夏的大学生当中有人看出了文革动向与宁夏党委的领导方向是相反的。在中共罢黜了宁大党委书记江云后，宁大的激进学生在 9 月 2 日召开了批江大会，并把斗争矛头直指宁夏区党委。在会上，学生指责江云的检查是区党委给准备的，他们要哈炯磊（宁大工作组组长）和王钊（江的秘书）来对证。区党委拒不给人，并否认曾包庇过江云。激进学生于是聚集区党委前，提出“区党委拒不交人是为了掩藏江和区党委之间的阴谋”（宁夏大学联合指挥部材料组编《革命造反有理：大字报选辑》第一集，1967 年 4 月，5-7 页）。“九二行动”是宁夏学生对区党委的第一次直接挑战，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反响。此后，宁大学生产生了对立的两派，但保守派占有绝对主导。

面对日益激进的学生，宁夏地方科层采取了进攻措施。9 月 12 日，自治区副主席陈养山作报告称，“宁夏的工作组并没有犯路线错误，只是犯了方法错误；杨静仁领导的区党委在执行文革中采取了正确的道路”。此后，银川大街上贴满了攻击宁大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批判区党委的大字报几乎消失（宁夏大学联合指挥部材料组编《革命造反有理：大字报选辑》第一集，1967 年 4 月，40-48 页）。对此，银川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策划了更为激烈的行动。9 月 21 日宁大激进学生组成的革命串联队贴出大字报，号召在 25 日召开“揭露宁夏区党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会。二十多个单位的造反者对通知做出了响应，并一起组织了大会筹委会。大会在区党委的阻挠下如期举行。马玉槐、杨一木和陈养山被点名批判。会上同时也出现了如“杨静仁是宁夏牛鬼蛇神的大红伞”、“宁夏区党委是黑线黑帮”、“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口号（宁夏大学联合指挥部材料组编《革命造反有理：大字报选辑》第一集，1967 年 4 月，20-30 页）。

“九二五大会”时，由北京红卫兵鼓动扶植起来的银川造反派在数量和势力

上都还很有限，他们在银川处处受压，而且北京红卫兵还被驱赶，但是宁夏科层的权威已大大受损。9月底，大量宁夏学生冲破区党委的控制去北京串联。在北京红卫兵的保护下，宁大串联队的领导最后也得以进京串联。随着文革在10月份激进转向，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壮大。

四 造反派兴起和文官科层的瓦解（1966.10-12）

北京红卫兵在地方受到攻击和地方造反派受压的情形通过串联红卫兵传到中央。自9月中旬起，毛开始对在科层控制下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产生了不满，并酝酿着运动的转向。10月1日，林彪在国庆讲话中指出文革进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而资反路线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群众造反进行压制。而后，毛召集地方领导参加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对他们处理文革的方式进行了批评。“批资反线”和10月工作会议打破了各级地方党委在百姓中的神圣地位。在制度“克里斯玛权威”被毛剥夺后，各级文官科层走向瓦解，受压的造反派红卫兵则迅速崛起。

银川的发展照旧比北京滞后。直到10月中旬，宁夏区党委仍在组织干部和保守群众对宁大的造反学生和“九二五大会”进行攻击（宁夏大学联合指挥部材料组编《革命造反有理：大字报选辑》第一集，1967年4月，48-54页）。但随着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毛的态度日益明确，这些攻击迅速消失。同时，宁大造反派红卫兵正式退出“红卫兵总部”，并组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该组织成员标准宽泛，大量被老红卫兵排除在外的学生加入了这个新组织。通过串联，银川学生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正如一名红卫兵所讲，“串联彻底解放了我的思想。看到北京那么多高层干部被批斗，我感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遍地都是。批斗地方党委干部是绝不会犯错误的。”（第46号被采访人）

进入10月下旬，区市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在银川形成。10月底，宁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了一个“联合总部”，以协调宁大的各派造反组织。不久，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成立了自己的区市级组织。宁大联合总部开始向党政机关和厂矿派出串联队发动造反。造反派在各单位内大都是受压的少数派，他们因此也会主动寻求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银川文革因此从单位转向区市层面。11

月，银川形成了以行业系统为基础的区市级造反组织。

工人造反派的出现是当时的焦点。厂矿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放开对工人的限制，将会直接威胁到经济生产和国计民生。早在9月份，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不允许工人成立自发组织和发动串联，工人造反组织因此有着合法性的问题。11月下旬，银川的一些工人组织要求区党委批准其成立区市级组织并供应相应物资，区党委则以中央9月文件的名义予以拒绝。但进入12月，随着运动的发展，毛认为工人参加造反是文革的必然，中共中央在12月9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批准工人在文革中自由成立组织和进行串联。此后，银川的工人造反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银川工业薄弱，党政机关和文教系统的造反派因此在银川文革中始终起着领导作用**）。鉴于造反力量的迅速发展，各单位的保守派群众也在干部的操纵下成立了“捍卫毛主席联络站”这样的联合组织，与造反派对抗。至12月中旬，银川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

与其它省市相似，银川的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成员构成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保守派有“五多”：红五类多，党员多，团员多，干部多，积极份子多。他们是文革前秩序的受益者。造反派中则包括了从红五类到黑五类的各种人，其中有不少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各单位的受害者或受牵连者，特别是在宁夏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中和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宁夏在1960年曾发动过如下两场地方性政治运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于1960年上半年在区党委中进行，以刘格平为首的老区党委领导班子被认为是“搞地方民族主义”被罢官或降职，由以杨静仁为首的新领导班子代替；以消除地方民族主义的社会根源为名，1960年下半年宁夏区党委在社会上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坏人坏事运动”，大量群众遭到了迫害。这两场运动在干部和群众中留下的伤痕是影响宁夏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造反派因为在本单位内处于劣势而走向社会，但是一旦走向社会，其诉求便超出了单位内恩恩怨怨的限定，形成了超单位的诉求。但社会上的造反派并没有真正的统一，他们有的只是在受当权者压制时暂时联合，一旦外部压力消失，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纷争就会爆发。与造反派比起来，保守派的组织

性和内部统一性要大得多，他们在人数上也要比造反派占优势。只是因为当时毛的政策偏向造反派，保守派才会在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占下风。

面对造反风潮，宁夏领导只有招架之功。12月11日，杨静仁被迫承认区党委在工作组问题、对待群众组织问题和串联问题上犯了错误（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1925.8-1988.6》359页）。15日至16日，宁大红卫兵要求杨静仁罢马玉槐的官，杨含糊其词。造反派学生决定将宁夏区党委的领导拉到北京评判。16日下午，宁大红卫兵卧轨拦车将马玉槐带到北京。中央责成杨静仁和区党委副书记甘春雷赴京处理马的问题。在北京，当中央表示明确支持造反派学生后，甘转而支持学生，并对杨进行了揭发。1967年1月12日，宁夏造反派召开了批判杨、马的大会。15日，杨、马从北京被带回接受群众批判。杨刚下火车就被带上牌子游街（大江东去《人间正道是沧桑》，1967年4月27日，第7页。收于银川工业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挥部编《论宁夏一·二七夺权：大字报汇编》第二集，1967年7月15日；第30号和第38号被采访人）。18日，陈毅接见宁大毛主席思想红卫兵，明确提出杨、马应被打倒。宁夏文官科层遂彻底陷入瘫痪。

在中央明确表态打倒杨、马后，保守派群众意识到自己“站错了队”。他们或重新改组，或改变组织名称以适应新形势。有些保守派组织甚至与造反派比激进，他们在喊打倒杨、马的同时还加入了区党委中许多其他干部。这种行为体现了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盲从性和投机性。保守派群众打出了造反旗号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限变得模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组织联合起来反对共同对手是常见现象。

五 一月夺权——文革制度化的失败

区党委被打倒后，银川陷入了全面的混乱。生产停滞，经济主义风潮蔓延，同时在双反运动中受害的干部和群众要求平反的呼声日益增高。银川出现的这种现象并不独特。1966年底，全国各地因为地方党委的瘫痪或半瘫痪都处于无政

府的混乱状态，这成了毛在 1967 年伊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正值此时，上海发生了造反派夺权事件。毛决定对上海夺权表示支持，并号召全国的造反派都起来夺权。毛的用意十分明显，他想用造反组织来替代科层，从而将文革这一反例行化的革命状态制度化。在中央宣传机器的狂热煽动下，全国上下都陷入了夺权的疯狂中。

《宁夏日报》社造反派因信息灵敏，早在 1 月 13 日就得知上海的夺权消息，他们随即在本单位进行夺权。夺权风潮在银川迅速扩散。在许多单位，夺权就是抢夺各单位公章和办公室，许多人为抢公章大打出手。在各单位相继夺权的同时，宁夏区党委的夺权也被提到日程。区党委的夺权是由甘春雷、区党委造反派，和社会上的主要造反派领导协调完成的。1 月中，甘让区党委造反派领导与社会上的造反派联系商讨区党委夺权事宜。1 月 17 日，银川十三个造反派组织开会讨论夺权问题。会上造反派内部出现了分裂。首先是以北京为首的外地红卫兵和宁大红卫兵的矛盾，矛盾源于对权力分配的不满和思想认识的不同。北京三司驻宁联络站强调宁夏夺权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宁夏文革还需要大混乱大动荡。在北京红卫兵的煽动下，中学生红卫兵从大会退出。虽然如此，十三个组织中的大多数同意联合夺权。1 月 18 日至 25 日，这些造反组织成立了“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起草了夺权公告，选举了七名常任委员，并决定建立文革和生产建设两个办公室。1 月 20 日，主要造反派领导去宁夏军区寻求支持（此时毛已命令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所以军队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宁夏军区派出副司令员张怀礼参加造反派夺权（银川市工业系统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部编《发扬“一·二七”革命造反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字报汇编》第一集，1967 年 3 月，1-4 页）。

在造反派准备夺权的同时，打出造反旗号的原保守派群众也在加紧准备夺权。迫于形势，造反派只能在 1 月 27 日匆忙提前夺权。在军区派出的士兵和宁大红卫兵的保卫下，造反派夺了杨、马的印章。夺权后，联委会立刻进行游行示威庆祝夺权胜利。仓促夺权并没有结束银川的混乱局面，相反它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首先是内部分歧。夺权后，为建立革委会，联委会准备为在 1960 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害的干部平反，并吸收他们加入新的权力机构

（他们一直暗地里支持着本单位的造反派）。但是这些干部因受迫害的程度不同而对平反方式产生了不同要求，这些问题与群众组织之间对革委会的权力分配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联委会的分裂。一些造反派退出联委会，成立两个新组织：宁夏总司和三司。这两个组织的力量与联委会比起来人少势弱，但是他们却削弱了联委会的力量（他们同时反对造反派和保守派，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派）。与此同时，原保守派组织和夺权前退出联委会的以北京红卫兵为首的造反派组织组成了反联委会联盟。联委会在反对力量的夹击下根本就无法行使其权力。银川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特殊，毛并没有给出一套具体的指示来指导夺权，再说，在争权夺利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即使是毛有指示，也不见得会有效。这就使得夺权在大多数省份完全成了一场场无序的争夺。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夺权后许多省份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造反群众开始冲击各省军区。这背后有两个原因。首先，随着运动的激化，军事科层作为未被触动的科层力量必然会成为攻击对象。更重要的是，由于造反派中很多人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夺权后造反派马上要求销毁地方权威整理的关于他们的“黑材料”。但是，许多地方党委在这时已把那些重要档案，包括“黑材料”，送到军区保存。于是一些造反群众试图冲击军区以获取这些材料。军队混乱会导致整个政权的垮台，毛对此不能容忍。这迫使毛在文革中第一次对文革的发展作出朝着缓和方向的调整。1月下旬，毛禁止了造反派对军队进行攻击，并下令军队支持左派。

六 毛的困境

（一）军事科层还是群众派性

夺权后文官科层四分五裂，文革精神推到了极端，但是社会却没有向毛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换来的是一片混乱（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版1472页）。这就迫使毛不得不下令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试图用军事科层的力量来驾驭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并于2月下旬提出革委会应采取“三结合”（军队、干部和造反群众代表）的形式。但是，各地军事科层与文官科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事科层对造反

夺权有着本能的反感。比起文官科层，军事科层更为讲究纪律和服从，因此他们在处理事务时往往更会遵守例行，压制难以驯服的造反派，使整个社会朝着反文革的方向走去。军事科层的这一倾向又使毛转而支持造反派，对军事科层施压。可是毛一旦这样做，整个文革又会朝着混乱的方向发展。在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间，毛的政策一直在保守和激进两个极端摇摆，直至对造反派力量彻底失望，下决心镇压他所一手发起的造反力量为止。

军队的介入使得军区对联委会的态度变得十分重要。但是，宁夏军区与区党委关系密切。联委会刚成立时，军区对他们的支持纯粹是迫于一时政治气候不明。1月底后全国形势往右转。在这一背景下，宁夏军区以一件很小的事件为借口对联委会施行了镇压：当时《解放日报》一名记者到银川收集当地运动的情况，该记者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他在采访过程中因一些小事与联委会下属成员发生了争执。盛怒中他来到宁夏军区声称夺权太乱不应批准（**第30号被采访人**）。军区乘机改变了对联委会的态度。2月8日，北京三司驻宁联络站从银川郊区动员了一个由杭州下乡青年组成的造反组织来砸联委会。作为回敬，联委会的造反派把三司驻宁头头赶回了北京（**过大江、红雨《不废江河万古流》，1967年5月30日，第5-7页。收于银川工业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挥部编《论宁夏一·二七夺权：大字报汇编》第二集**）。联委会这一行动给军事科层以镇压的借口。第二天，军区司令朱声达召开会议讨论一·二七夺权是否正确。会上朱声称联委会在夺权期间对其它群众组织执行了白色恐怖和排外政策，“二八事件”充分暴露了联委会的右倾本质。2月11日，宁夏军区发表公告撤销对联委会和其夺权的支持。联委会夺权十六天后流产（**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8年元月27日，103-108页**）。

随后军事科层试图将造反派从组织和舆论上彻底摧毁。2月19日，宁夏军区发表“给全省人民的一封信”，指一·二七夺权是“在资产阶级当权派甘春雷指导下的右派夺权”（**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16-120 页)。之后，军区以银川清洁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中医院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内部有“坏份子”为借口解散了这两个组织，并且关闭了宁大红卫兵所举办的宁夏文革造反派展览并没收其材料（宁夏地方文献馆收集《宁夏各种小报汇编》，银川，1967），军区主持的三千会、公交会、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等都以一·二七夺权为界，不准支持夺权的干部参加。同时，军区动员了保守派组织攻击联委会。夺权被标记为“甘春雷操纵下的右派夺权”，联委会则被攻击为“联委会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在军区的支持下，保守派组织联合建立了“革命大联合筹备处”（宁夏地方文献馆收集《宁夏各种小报汇编》）。

在此形势下，联委会在3月7日发表声明，要求与军区通过商讨解决分歧。朱声达显然不想妥协。作为响应，他称三七声明为“一小撮右派头头的阴谋诡计”，要求联委会“交代罪行并交出他们的头子甘春雷”。他并且动员了保守群众发动一场“抓右派头头”的运动（宁夏地方文献馆收集《宁夏各种小报汇编》）。此时，一批一直在幕后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走到了前台（大多数是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打压的干部）。他们成立了以区交通局王志强为首的“翻江倒海战斗团”，公开表示支持联委会。宁夏军区内部也出现了支持联委会的声音（如张元礼和刘德夫）。但是，造反派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处于守势，在军区的压力下，许多人退出了造反派。联委会也不得不更名为“革命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第29号被采访人）。

造反派的受压状态随着毛的政策在4、5月间的变动而发生了根本变化。继反“二月逆流”后，毛对军事科层对造反派的镇压，多次表示了不满。4月初，中央军委下达指令，正式取消军队对文革的控制权。毛的政策变化给宁夏造反派带来生机。但是造反派的复苏并未能够击败军事科层及它支持的保守派组织。这其中四个问题。第一，军事科层和文官科层不同，军人作风强悍。他们同时掌握着军队，造反派不可能将他们随时抓来揪斗。除非是毛的亲自命令，否则他们是不会像文官那样轻易就范的。第二，军事科层是毛政权最为重要的支柱，军队乱了会导致境外敌对势力的入侵，军人急了会有兵变。因此毛不会像对待文官一

样对待军队干部。第三，在十来个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但形成了造反组织，而且还造就了一群与军事科层有很大亲和力的、同时也声称是在进行革命的原保守派组织。有了这批人，军事科层的气要壮得多。而对毛来说，“敌我”阵线已不像文革之初那么清楚。第四，十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已把中国弄得天下大乱，各地问题不断且问题性质不同，中央疲于奔命，顾此失彼。4月间毛的言论虽然给了造反派复兴的机会，却没有对军事科层支持保守派组织给予明确否定。这样，毛在4、5月间的变化不但没有压垮各地军事科层，反而造成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各地造反派在毛的新动向鼓励下咄咄逼人，原有的保守派在地方军事科层的支持下也打着造反的旗帜，与造反派针锋相对，派性武斗在许多省份愈演愈烈。银川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各地军事科层对造反派的压制受到毛的批判后，朱声达则坚持中央的方向转变是中央文革的旨意，而文革小组不过是个办事机构，并无决策权力，他强调中央军委的指令给了地方军区“自卫”权力。为了对付日益活跃的造反派，朱用召开贫农会的方式动员农民加入保守派，并动员农民进城攻击造反派。他还指示筹备处到石嘴山、吴忠等地串联，与当地武装部建立联盟。为了增加其统治的合法性，朱让区党委的老干部加入军区领导的第一线生产指挥队（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03-106页）。

进入5月，造反派和保守派形成了严重对峙。5月初，被军区解散的两个造反派组织要求平反被拒，同时，造反派红卫兵在公安局前静坐和绝食，要求收回宁大的文革展览材料（中共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银川市档案馆编《中共银川党史大事记：1949.9-1996.1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版112页）。朱拒绝作出让步，与造反派针锋相对。筹备处在5月底砸了新华社驻宁分社，认为它是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小组于6月5日和6日向朱发了三个指示，命令他严肃处理这个事件，朱不予理睬。同时，由朱支持的筹备处和地方武装部在吴忠和石嘴山地区发起了武斗（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03-108页）。兰州军区命令朱改变行为，6月18日中央发令禁止军区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对于这些要求，朱都以中央

和上级机关不明了地方情况为由予以搪塞，充分显示了军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质。面对进攻，造反派的行为也变得更加激进。7月19日，造反派举行集会“声讨朱声达在武斗中杀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次日武汉七二〇事件爆发。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曾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马思义（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被降职）在7月24日率领约四百人进攻保守派实力强大的吴忠，并占据了吴忠仪表厂（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29页）。

筹备处于26日成立了宁夏大联合筹备处，对外称其成员达八十万人，与总指挥部抗衡。与此同时，总指挥部准备对筹备处发起大规模的攻击。7月底，因传闻说西塔是筹备处的总部，总指挥部的两个工人头头程学儒和刘青山率人攻打西塔，行动失败，二十多名人员被俘。随后，石嘴山一千二百多名矿工和钢厂工人乘坐五十多辆卡车进入银川支持总指挥部，当天下午他们攻下西塔。筹备处五人死亡，三百多人被俘（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30页）。

攻下西塔后，总指挥部在银川的实力占了上风。但是，马思义在率人攻入吴忠仪表厂后被包围，吴忠造反派告急。8月8日，总指挥部人员带着长矛乘数百辆卡车往吴忠解围。行至永宁县大观桥时，车队遭到了筹备处的伏击。枪是当地武装部发的，而参与伏击的人大多是复员军人。总指挥部一百多人死在大观桥，受伤者更多。大观桥事件后，造反派开始从军区抢枪武装自己（实际上是军区内的造反派让总指挥部的人员拿枪）。银川武斗开始大规模运用热武器。

8月13日，筹备处攻下吴忠仪表厂，马思义被打死。宁夏武斗于是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为了结束武斗局面，中央判定宁夏军区犯了严重错误，朱被召到北京接受审查，第一野战军六十二师进驻宁夏。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和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被指定为新领导。8月18日，兰州军区宣布总指挥部为革命造反派（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

件汇编》91-93 页)。形势骤变使筹备处的群众措手不及，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对野战军的进驻十分愤怒，于是就爆发了筹备处与六十二师间的冲突，并导致了青铜峡惨案。当时中央下令六十二师进攻在青铜峡守卫的筹备处武装人员，造成筹备处一百多人死亡。从此筹备处走向衰落（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85-86 页；第 18 号采访人）。

（二）军事科层和造反派的消亡

总指挥部在被确认为造反派后行为变得张扬。在单位中，总指挥部的成员对筹备处成员进行报复的现象十分常见。但是当时中央的政策是各派群众大联合，总指挥部因此失去了彻底搞垮筹备处的机会。在中央的操纵下，各派组织达成了协议，于 12 月 27 日宣布成立以新的军区领导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96 页）。

革筹小组成立后，韦伯的“例行化”机制重新启动。虽然革筹小组的领导都是冲着支持造反派而来的，但是造反派的反制度倾向决定了军事科层和总指挥部在蜜月后的必然冲突。他们的冲突起于革委会的人选问题。两个问题成为焦点：一是甘春雷是否应进入革委会（军事科层支持王志强）（甘曾积极参与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所以甘与王虽都在总指挥部内，但旧怨仍深。甘想让原区党委的一些干部进入革委会，王则大力反对。新军区领导鉴于甘与旧党委的深厚关联而偏向于王。这条信息由第 30 号被采访人提供）；二是宁夏四派群众组织代表在革委会应占的比例。军事科层坚持四派席位对等，而总指挥部则认为造反派应当占多数（以下记述主要是建立在宁夏革委会编辑的史料《宁夏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事件记载》，1974，和对当事人采访基础上的）。这分歧导致了总指挥部内部的分裂。于是就出现了拥护新军事领导的“小米加步枪”（米派）和拥护甘春雷的处于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布派）。1968 年 2 月 24 日，革

筹小组下发了一个革委会成员暂定名单以供讨论。这名单激起了布派领导的强烈不满：名单里没有布派支持的干部、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布派称“名单没有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用修正主义篡夺文革的胜利”。迫于压力，以康健民为首的革筹小组在名单中加入了布派的主要领导（《宁夏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事件记载》，第一部分《从 407 号文件发表到区革委会成立》）。

然而，军方在妥协的同时，暗地里动员米派指责布派攻击革筹小组。作为响应，布派在 3 月 2 日声明群众大联合和未来的革委会必须以革命左派为核心，甘的问题必须适当对待。声明发表后，布派的一个激进下属组织成立了“肃清叛特反资联络站”，专门进攻米派，布米两派之争开始深化。尽管分歧很大，但是在中央的督促下，宁夏革委会还是在 4 月 10 日宣告成立。

然而，1968 年 3 月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影响下，毛对文革的形势再度不满。如 1967 年 3 月一样，毛感到军队对文革中混乱形势的缓和走过了头，于是发动了“反击右倾风”运动。4 月 12 日，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反右倾风运动的执行。“反右倾风”为布派提供了良机。在会议上，布派领导批评了革筹小组的右倾保守主义。康健民不得不作出自我批评并宣布欢迎甘春雷回来。运动转向后，军方试图把斗争的矛头转移到影响力已经很小的筹备处身上，但是布派则力图打击军方领导和王志强，从而获得对革委会的控制。布米之争继续深化，武斗再度爆发。5 月 2 日和 7 日，固原地区爆发了布米两个下属组织的武力冲突。同时，银川米派两千多人攻击了布派以刘青山为首的“八八交通兵团”，并发生了武斗。5 月 23 日，刘又进攻米派作为报复（《宁夏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事件记载》，第二部分《从区革委会成立到“六九声明”发表》）。

军区领导决定利用米派彻底搞垮布派以恢复秩序。6 月 1 日，在纪念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二周年的大会上，康健民指出在前两个月的反右倾运动中，存在着一股极左风干扰着运动的大方向。第二天，在军区的操纵下，米派一个下属组织砸了布派控制的工人代表大会的牌子。6 月 9 日，米派的几个下属组织发表了“六九声明”，指出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宁夏的第二套班子”。军队领导立刻表示支持，并声称要用六九声明统一宁夏的两百万人民。面对进攻，布派于 6 月 13 日发表声明称，目前运动的任务仍是“反右”：“六九声明是分裂革命阵营，

颠覆红色政权”。但是，布派错估了形势。两年的文革使中国变得满目创伤，毛作为当权者的一面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了群众运动的可怕，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两年前的豪气。在银川武斗加剧的同时，全国各地在相似背景下也再度出现混乱局面。7月间，毛不得不转而支持军方。

军方在毛转向后对布派发动了强攻。8月，军方领导的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各单位革委会里的布派领导被清洗。8月底，按照中央的指令，宁夏的四大派组织都被解散。9月9日，军方将布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宁夏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事件记载》，第三部分《从“六九声明”到二扩会召开》）。此后在宁夏革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中，布派的领导都在遭到批斗后被打倒（《宁夏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事件记载》，第三部分《从二扩会召开到党的九大》）。一场反科层的“克里斯玛”运动以保守的军事科层统治结束。韦伯就这样打败了毛。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7年6月号（总第一〇一期）。两位作者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本文第一作者于2004年12月至2005年3月间在银川收集了该地区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和档案数据，并对身份不同的五十名文革参加者进行了采访。

【蓦然回首】

毛主席头像事件

钱大川

一九七六年五月初，全国掀起了追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和追查政治谣言的“双追”运动，一时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时年32岁，任车间技术组长，就在这时摊上了一桩“政治事件”。

那时每个技术人员下达的图纸上方，都要写上毛主席语录，字体当然要用端

正、规整的美术体，这对技术人员来说是件较困难和麻烦的事，后来我就想了一招，用橡胶刻了两枚毛主席头像：一个是毛主席身着军服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另一个是毛主席头戴八角帽在延安，同时又在其下方刻了几句相关的语录，这样，要用时往图纸上一盖就成了。

不久，这个既省事又美观的办法，被其他车间技术人员知道了，都纷纷拿着图纸到我这里来“盖章”，为了方便大家使用，我就将这两枚“印章”用线绳分别拴上，挂在我办公桌侧面，这样，不管我在或不在，大家随来随用，又可防止被拿走。

大约过了一周，突然一天车间通知我到厂革委会政工组去一趟。我进门还没坐稳，革委会李副主任就严肃地指着桌上一张照片，用他那浓厚的山东日照口音问道：

“这是你干的吧？”

我把照片拿过来仔细一看：这不是我桌子侧面用绳子系着的两枚毛主席头像印章吗？我问：

“这是我刻的，怎么啦？”

“我是问是不是你干的？”

“什么……是、是我干的。”

“你用心何等险恶，居然敢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头像用绳子吊儿郎当地倒吊在你桌下……”

“这是误解，我只是防止被人乱拿……”

“住嘴！你现在还敢狡辩，我看你是在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顶风而上啊！你这是和天安门反革命分子遥相呼应啊，你这是典型的现行啊……”

当天我就被停职反省，没过两天，车间急了，因为我负责的型砂线改造工程设计也停下来了，图纸出不来要严重影响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的落实。为此，车间找到厂部，要求对我实行边工作、边检查的处理办法。上边同意了，但要我必须尽快拿出书面检查。当时我有自己的原则——口头怎样检查都行，但就是绝对不能落在纸面上，可怎么能逃过呢？

同事中有人暗中给我出主意：“你不是有慢性阑尾炎吗？咱们来个急性发作……”就这样，当天下午，我被大家“急救”送往医院。我要求手术，大夫同

意了，术后我又谎称肠粘连，又开了张病假条在家休息，但我的心静不下来，因为型砂车间广大工人那些企盼改造的眼神，时时在催我，为此我在家里又支起图板开始了设计工作，每当完成一张装配图后，车间就偷着派人取走，然后再由技术组分解绘制零件图。

随着图纸一张张完成，神州大地一件件让人心碎的消息也传来：先是七月初朱老总的去世，接着七月末又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可能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影响，厂革委会对我的“毛主席头像事件”的追究也放松了，但我的设计工作却进入紧张阶段，后来在我的要求下，车间将技术组我的两位知己派到我家协助工作，这可把我乐坏了，因为我们三人是无话不谈的“老铁”，工作之余大家传阅着来自北京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谈论着南京事件、杭州事件……分析着当时的政治势态。

九月九日下午约3时，突然听到离我家不远的一所小学传来一阵广播喇叭播放的哀乐，我们都愣住了，最多不超过3秒钟，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喊出：

“毛……”

“嘘……”我赶紧做出禁声手势，急忙打开收音机，立刻传出哀乐的伴奏中那深沉、浑厚的男低音，报道了“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新闻。

我们惊呆了，这虽是预料中的事，但也是始料不及的事，更是一件让人们忧虑和迷茫的事——难道今后中国的命运就要被江青那些人主宰吗？中国能否永远结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震惊之余更有企盼，企盼文革的结束，企盼新政的诞生。

【故纸堆】

按：如果现在的青年人想知道什么叫“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么，他可以从下面的教材中得到一些启发。这种服务源远流长，至文革而达到顶峰。上海和北京的这两个中小学数学教材画出了顶峰的座标：崇拜领袖和歌颂工农。通过剪忠字，让学生认识轴对称图形。通过工人平移烟筒的事例，让学生了解垂线。同时还要突出“阶级斗争”：数学练习题可以是对刘少奇的批判会。教材编写者的

才智和苦心，不用于教材教法，而用于“政治正确”。这样的教材教给学生的是什
么？

文革教材节选·数学

上海市小学暂用课本《算术》（六年级第一学期用）

上海市小学教材编写组：

1967年8月

第二单元节选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
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二 百分数

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常常要用到分母
是一百的分数。例如：

先锋电机厂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后，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
产”的指示，今年第二季度的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八，六月份的总
产值相当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百；

东方红纺织厂，今年上半年棉纱的总产量，完成了上半年生产计划的百分之
一百零九点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中呈现出一片大好形势。光明生产队夏熟作
物的总产量今年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

象（像）上面这些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叫做百分数。

百分数通常采用一种简便的写法，就是去掉分数线和分母，在分子后面加上
百分号“%”。例如：

百分之六十八写成 68%，

百分之二百写成 200%，

百分之一百零九点七写成 109.7%，百分之七点九写成 7.9%。

写出下面各数：

(1) 上海照相机二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二月份主要产品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

(2) 吴泾化工厂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五月份主要产品合成氨的产量，比四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三。

(3) 红旗电讯仪表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前，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破坏，1月中旬只完成全月计划的百分之二十八。夺权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下旬完成了全月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一·六。

(4) 从 1966 年到 1967 年全国粮食征购计划到 2 月 20 日止，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四·五六。

(5) 上海工业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工业生产呈现一片大好形势。今年一到五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

(6) 重型机械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四、五两个月完成的总产值相当于一季度的百分之八十四。

本单元练习题选——

练习十五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1. 上海出版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尖兵，积极赶印《毛泽东选集》，今年承担印制 1230 万套的光荣任务，两个半月已印制 320 万套，这两个半月完成了全年计划百分之几？

2. 某县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从原来 1800 个增加到

2700 个，增加了百分之几？

3.从 1966 年 7 月至 1967 年 7 月初一年中，本市已发行了革命宝书《毛泽东选集》385 万套，相当于解放后十七年来发行总数的 550%。解放后十七年只发行了多少万套？

4.某校上学期预订《毛主席语录》600 本，第一次送来 45%，第二次送来 35%，第三次送来 20%。三次各送来多少本？

5.工农兵占领美术阵地，大张旗鼓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画展”正式展出。展出作品共 400 幅，其中 70%是工农兵群众创作的。工农兵创作的作品是多少幅？

6.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上海印制的 100 开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即将出版，今年预订生产 650 万本，上海发行 300 万本，中央军委发行 200 万本，外地发行 150 万本。上海、中央军委及外地的发行数各占总数的百分之几？

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数学》第二册

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

(1969 年 1 月)

最高指示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第四章 简单图形

I 垂线和平行线

4.1 角

北京电报大楼上的时钟（图 4—1），从清晨到深夜每小时都播放一次“东方红，太阳升”的雄壮乐曲，表达了世界革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美好祝愿和无限忠心。

电报大楼时钟的时针和分针之间构成一个角，同样，张开的剪刀、铡刀与底座、张开的圆规，都分别构成了角（图 4—2）。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升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由于多次实践，使我们形成了角的概念：从一点引出两条直线所组成的图形叫做角（图4—3）。（下略）

4.2 垂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海第三钢铁厂的工人师傅敢想、敢干，把两座高达五十五米、重二百三十吨的巨型平炉大烟筒，分别用了八个小时和五个小时，“垂直移位”三十一米和四十米，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奇迹。

“垂直移位”就是大烟筒在移动时，和地面保持垂直。

在数学上，如果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就说它们互相垂直。……

4.3 平行线

（一）平行线

曙光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教导，在夺得夏粮大丰收之后，又投入新的战斗。双轮双铧犁奔驰在人民公社广阔的田野上。

用双轮双铧犁犁出的两条笔直的垅沟是互相平行的。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平行线。……

（二）平行线的性质（略）

（三）平行线的判定

在实践中我们有时需要判定两条直线是否平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下略）

II 三角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刻，又一曲毛泽东

思想的胜利凯歌响彻云霄。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长达 6700 多米的现代化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全部建成。

从图 4—20 中，可以看到凌空飞架的巨大钢梁，笔直地横卧在矗立江心的桥墩上，排列整齐的三角架有力地支撑着大桥的钢梁。“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大桥的钢梁为什么要用三角架结构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三角形有如下的特性。（下略）

4.4 三角形和它的内角和

（一）三角形的分类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

按照角的情形，三角形可以分为三类：……

（二）三角形的主要线段（略）

（三）三角形的内角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我们作一个实验：在硬纸上任意画一个三角形……（证明三角形内角和等于 180° ，略）

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教导我们：“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和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

通过上面实验的启发，还可以直接用推理的方法来证明这个结论。（下略）

4.6 简单轴对称图形

（一）轴对称图形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让我们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深厚阶级感情，剪个“忠”

字表忠心。

我们剪“忠”字时，可以把纸对折起来剪（图 4—39）。因为这个图形沿着中间的直线对折过来，左、右两部分能够完全重合。一般地，如果把一个图形沿着中间的直线对折过来，直线两旁的部分能够完全重合，这种图形叫做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叫做对称轴。能够重合在一起的点叫做对称点。（下略）

（二）等腰三角形

观察图 4—19（注：原书排错，应为 4—20）南京长江大桥钢梁结构中的三角架，可以发现这些三角形都是等腰三角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等腰三角形是特殊的三角形，它有些什么特殊的性质呢？（下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轴对称图形的一般性质。（下略）

（三）等边三角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

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等边三角形的性质：（下略）

最高指示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习题二

……

11，我们要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脑子里要印上“忠”字，心坎里要刻上“忠”字，口里要宣传“忠”字，行动上要体现“忠”字。让我们动手剪个“忠”字表忠心。

12，正当全国亿万军民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乘胜前进的时候，全国除

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让我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利用轴对称原理，剪个“囍”字，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

(下略)

第五章 农村测量

I 相似形

伟大领袖毛主席挥动巨手，为我们写下了为人民服务（注：教材中此五字为毛氏手迹复制）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红旗证章厂的革命职工，为了让广大革命群众永远铭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怀着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心情，经过精心设计，把这五个大字缩制成多种不同规格的精致的语录章（图 5—1）。

通常，我们把这些形状相同，大小不等的图形叫做相似形。

(下略)

第六章 打方与估囤

.....

6.7 粮堆、粮囤的估算

生产队经常把场上的粮食堆成圆锥形，或装入席子围成的圆台形的囤里。如何估算粮食的斤数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广大贫下中农创造了许多简便实用的经验公式，而且这些公式还适用于估算草堆、粪肥堆、沙石堆等。但是过去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把这些在生产实践中常用的知识排斥在数学教材之外，让青少年埋在抽象的概念堆里，去钻一些脱离实际的难题，其目的就是把青少年培养成高居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真是罪该万死！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

(下略)

第七章 农村会计常识

.....

7.1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贫下中农掌好财权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反映在农村集体经济的财会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同样是尖锐、复杂、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夺权胜利以后，被推翻的阶级敌人，还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表现看来，财会工作无非是计账、算账、打算盘、钱来钱往，但是数目字中有政治，算盘上有阶级斗争。所以会计工作首先是一项政治工作。

.....

练习

- 1.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介绍农村中在财权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情况。
- 2.开批判会，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农村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路线的罪行。

注：本教材全书 170 页，连封面、扉页在内共用毛泽东语录九十余条。

(渔歌子 选录)

【小资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 年 8 月 26 日成立)

主任——

韦国清，55 岁，壮族，广西东兰人，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贫农出身

副主任——

欧致富，54 岁，壮族，广西军区司令员，雇农出身

魏佑铸，49岁，广西军区政委，地主出身

焦红光，44岁，空七军政委，中农出身

霍成忠，47岁，五十五军第一副军长，富农出身

安平生，51岁，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富裕中农出身

韦世经，32岁，广西壮族自治区航运局船队服务员，“联指”派“红色工人”负责人

林福文，广西壮族自治区航运局船舶修理厂工人，原“四二二”派“航运工总”负责人

毛凤鸾，女，24岁，凤山县谋屯公社民兵班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联指”派

廖炜雄，39岁，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组织部干部，“联指”负责人

龙智铭，25岁，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厅设计院秘书，原“四二二”派“火种”负责人

颜景堂，24岁，广西大学学生，“联指”派“能闯万重关野战军”负责人，“联指”总指挥

曾春生，22岁，广西医学院学生，原“四二二”派负责人

常委——

陈开路，56岁，广西军区副司令员，贫农出身

徐其海，55岁，广西军区副司令员，贫农出身

刘重桂，53岁，广西军区副司令员，贫农出身

韩世福，58岁，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

伍晋南，59岁，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赵茂勋，54岁，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委副书记

萧寒，44岁，原中共南宁市委书记

邓成汉，38岁，南宁橡胶厂工人

邓文光，34岁，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工人，“联指”派负责人

蒋莲英，女，27岁，南宁化工厂助理技术员

萧桂荣，女，21岁，兴安县漠山公社大队妇女主任

农其新，25岁，德保县燕洞公社生产队长

何作然，22岁，广西大学学生，原“四二二”派“南宁八三一”负责人

潘玉臣，27岁，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监委秘书

李家海，26岁，南宁橡胶厂车间指导员，“联指”派负责人

广西两大派为“联指”派与“四二二”派。“联指”即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四二二”原称“南宁四二二革命行动火线指挥部”，后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西四二二指挥部”。作为“四二二”派代表进入革委会的林、龙、曾、何等人在1968年春因被“四二二”派视作已受韦国清“招安”的“叛徒”而于3月29日撤销常委职务，但他们自称“老四二二”，此后“四二二”派为与他们划清界限则称“新四二二”。“新四二二”在当年7、8月被军区与“联指”派联合武装镇压后彻底瓦解，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无代表。“老四二二”的这几个代表在革委会成立后不久亦遭排斥和清洗。

【编读往来】

一、旅欧读者金瑞来信，就上期《从“自我检讨”到“大批判”——文人理想和信念的彻底破灭》一文发表感想：

“文人理想和信念的彻底破灭”，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东西。

“五四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主意识”，但他们很容易地被“改造”了。不管方式如何，柔和的，还是强制的，其实都一样，是某种目的下的手段。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多数文人都看不透这背后的东西，都被一步步地带入改造的陷阱，被彻底洗脑呢？我不认为那些人在那个时候写的东西，说的话，都是违心的。相反，我认为，他们说的写的，相当一部分应该是真实的想法。像老舍那些文字，你敢说那都是违心的？为什么应该具有独立思想的

知识分子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这样的结果，不是单方面能造成的，没有“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主意识”的文人们的主动配合，改造绝不会成功。例如战犯的改造，对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起作用，这是因为当事人在思想上并没有主动配合的缘故。那个时代对我来说，是个很奇妙的时代，当时人们的意识状态很特别，有些不可理喻。文人们的悲剧在我看来，自身的原因绝对不可忽视。外部的状况，社会的因素尽管很重要，但这些人内心深处的一切，也应该成为被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方面。

一个人，不应该用放弃自我一切的方式，来服从“高高在上”的东西，国家也好，党也好，都不能剥夺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利。“五四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他们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

二、旅美读者 Chuang^ Chen 来信纠错——

我昨天看了 27 期《记忆》的文章，发现在选载的语文课本目录中出现一些文字错误，列举如下：

北京教材第 9 篇中“南京长沙大桥”应该是“南京长江大桥”，这在重庆教材第 19 篇中也出现了。

第 13 篇中“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洪”应为“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

第 16 篇中“东海船队”应为“东海舰队”；

重庆教材“语文知识（一）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第四行中“一字字”应为“一字字”，在引用林彪话中“一句顶一万句”应为“一句顶一万句”。

这些错误估计是在从图像扫描成文字时出现的。

本刊特为以上录校错误向读者致歉，并向指出错误的热心读者致谢。